

重思「海洋」與靠海生活： 能供性的取徑*

饒祐睿

國立臺灣大學
人類學系

近年有越來越多關於海洋與濱海人群生活方式的研究，尤其著重在海洋不同於陸地的特性以及相關的傳統生態知識，但經常從一般預設的海洋特質展開推論，或者著重於列舉環境知識本身，而將人們在與海洋的互動中一方面創造性地生產知識，另一方面建構自身經驗的海洋特質，並進而在二基礎上活出生活的過程簡單帶過。本文以雲林濱海漁村為田野，以能供性勞作 (labor of affordance) 為分析取徑，呈現包含潮汐、海氣象與各種水產生物特性等海洋要素如何在漁民的日常實踐中，透過工具的活用被經驗甚至改造，並說明正是在這樣的海上勞動過程中，海洋成為能支持當代靠海生活的地方。這樣的民族誌書寫著重於漁民與海洋的創造性互動，以回到漁民日常生活的脈絡來理解「海洋」，並嘗試從漁民構作環境與生活處境的日常實踐來描繪「海洋文化」。

關鍵詞：漁業勞動，海洋人類學，時間性，漁具漁法，在地環境知識

投稿日期：2025年8月5日 接受出刊日期：2026年1月19日

*謝辭：本文改寫自作者碩士論文第一章與第二章部分內容，感謝呂欣怡教授在碩士期間的指導以及在改寫上的建議，鄭肇祺教授與容邵武副研究員在口試時的精闢提醒，以及多位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碩士班、博士班同學在寫作期間的討論與支持，尤其是蕭冠祐、吳昭潔、李若慈。本文能寫作完成，最要感謝的是靠海村漁民不嫌棄一個每隔一段時間就來東看西看的學生，耐心說明自己的生活，而能得到漁民的接納，要感謝劉如意學姊在我前往靠海村之前已經建立的信任關係。廖俊凱先生協助釐清了許多台羅拼音書寫上的問題，兩位匿名審查人精闢的建議亦使得本文更加完整，但任何未盡周延之處，責任仍由作者自負。最後，碩士論文受到2023年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與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的合作培訓計畫「物的轉譯與文化轉化：日常與時間」之田野可行性調查補助，以及112年度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論文寫作獎助，一併在此致謝。

一、前言：當代靠海生活

坐落於雲林西南、濱海而居的靠海村，¹大部分居民以捕魚和養蚵等較為傳統的「討海」（thó-hái）活動為主要經濟收入來源，但與一般對臺灣鄉村沒落、老化的直觀聯想不同，這裡有不少青壯年人口，水產交易仍然興盛，近年來鄰近漁港內小型漁船也不是越來越少，而是越來越多。對於這樣的現象，靠海村的人們往往以這裡收入不比都市差且「自由」、不用被人管來解釋。靠海村的漁民能這樣表述自己的生活，顯然與緊鄰村落的海洋有關，並且這片海洋，似乎不只具有一般認為的危險、充滿不確定性的意象。

「我聽很多人都說漁民的生活很自由，妳也這樣覺得嗎？」我想起自己雖然已經與蘭姐相當熟識，卻沒有問過她這個問題。那時我正在幫她「清網仔」（tshing bāng-á），一手拉著漁網，一手拔除漁網上幾天前起網時纏到的木條、繩索或塑膠片等海洋廢棄物，相同的動作已經重複了一個多小時，那一桶漁網卻仍然像是沒有減少。現在想來，會想起要問這個問題，或許也是因為對那重複、單調又費時的工作感到厭膩。「當然啊！」雖然前一天蘭姐還去幫忙親友做傳統的結婚儀式，今天又一早就來到停泊在漁港內的漁船上清理漁網，但她仍相當有精神，「有什麼地方可以像這樣，要什麼自己去抓，下了網就有錢賺，吃得又新鮮？」她回答我的時候，手邊的工作也沒有停下。在這樣的說法裡，海洋並不是一種單純的環境限制，反而是她「自由」的生活之所以可能的原因。

這時，另一位漁民阿海嬸正好騎著機車來到漁港，見到蘭姐便打了聲招呼，我順著提起住在阿海嬸家對面的小文昨天很勤奮地出海放了十八桶的網子，抓了四五十斤的三牙的事。那幾天天氣很好，但是大家都在抱怨抓不到什麼魚，因此昨天聽到小文抓到三牙時，我有些為他高興，然而蘭姐聽了之後卻說，放了十八桶的網子，卻只抓了四五十斤，那這幾天的漁獲確實算少。「不過，也是要喜歡海」，我原本以為已經結束的話題，她再次提起，並告訴我，

1 此為田野地化名，本論文提及的所有人名亦為化名。

二十歲出頭的小文一開始也沒有打算繼承家裡的漁船，是因為一次偶然去當別人的「海腳」（hái-kha）²時，很喜歡待在海上的感覺，所以對漁業產生了興趣。雖然她將小文的選擇直接關聯到海上航行經驗，但我以前問小文為什麼會留在家鄉討海時，他的回答倒是相當直白：因為這裡有錢賺；而從蘭姐說這裡「下了網就有錢賺」來看，這對她來說也確實是一項重要原因。³

近年來，人文社會研究對於海洋越來越重視。在理論層次上，這往往是因為海洋被研究者認為具有不斷流動的物質性，能有力地反駁從陸域預設展開的各項政治理論（如Steinberg and Peters 2015）；而在現實議題上，則是因為海洋相關的傳統生態知識在文化政治、環境治理與臺灣主體性論述上的重要性（如鄭螢憶、李侑儒 2024；蔡政良 2023；邱文彥等 2020）。然而，這些討論往往是從研究者或理論建構者對於海洋預設的特質展開推論，進而如Helmreich（2011）所言，將海洋視為「理論機器」（theory machine），忽略了海洋實際在人們生活中的樣貌。從上述田野故事來看，對於蘭姐而言，海洋顯然有一項重要性是讓她「有錢賺」。這是蘭姐「去海」（khì-hái；這是靠海村在表述海上勞動時最常見的說法，指稱包含捕魚、養蚵，以及各種前往海上進行的生產活動）投入勞動而造就的成果，而非研究者透過自身對於海洋特性的認知預設的特質，但「有錢賺」的事實確實高度影響了她所經驗到的海洋，並且是她的「自由」生活之所以可能的重要原因。這帶出的是，若要更細緻地理解當代的靠海生活，⁴需要將漁民所互動的海洋放回漁民「去海」勞動的脈絡，關注漁民在與環境的互動之中構作自身生活的創造性。

2 「海腳」一詞在王崧興（1967）經典的漁村民族誌中即有紀錄，概略來說，「海腳」指的是與作為漁船所有者的「頭家」相對的，為一艘漁船工作但不具有漁船所有權的船員。不過「海腳」並不是領固定薪資，而是依據特定的比例分配每次航程所得的利潤，並且「海腳」與「頭家」之間的關係隨時可以解除。在當代靠海生活的情境下，不少原本由「海腳」負擔的勞動力改為聘用外籍移工負擔，不過我在田野期間，有時仍聽聞報導人提及去當別人的「海腳」的經歷。

3 以上田野故事改寫自我的田野筆記2023/05/27，除了最開始的問句外，括號內的標楷體引述皆為當下速記。

4 本文以靠海生活來指稱廣義上以海洋為重要倚靠對象的生活方式，而不預設特定族群或者產業。「靠海」的用詞選擇，除了描述空間上的接近性之外，也是為了呼應能供性的理論：「倚靠」雖然強調的是對於對象的依賴性，但是這樣的依賴之所以能成立卻是出於「倚靠」者本身的行動。

本文嘗試以能供性勞作 (labor of affordance) 為理論框架理解靠海生活以及海洋環境之於漁民的樣貌。這樣的嘗試不將海洋的意義停留在人們對於海洋的常見預設，如危險、流動、不確定性，而是從人們「去海」的具體互動脈絡開始，關注漁民如何在日常實作來展開生活與靠海世界。⁵本文將先回顧目前關於海洋與靠海生活方式的討論，接著在說明田野歷程與田野地脈絡之後，從漁民強調的「經驗」開始對於靠海生活方式的分析。這包含三種靠海生活的重要要素：海洋生物、海氣象狀況，以及各項環境物質韻律，如何在漁民的創造性實踐中浮現意義 (make sense)，其過程又如何涉及漁具漁法、漁船與養蚵技術等工具的活用。透過這樣的民族誌書寫，本文回到漁民日常生活的脈絡來理解「海洋」，並嘗試從當代漁民構作環境與生活處境的日常實踐來描繪「海洋文化」。

二、分析靠海生活

本文以能供性來重思靠海生活，主要回應兩項議題：在理論建構上，從預設的「海洋特質」展開推論與反思，卻反而將海洋本質化為特定樣態的疑慮；以及在民族誌書寫上，過度強調對於地方環境知識本身的逐一系列，因而忽略了人們生產知識、世界與自身生活的創造性的傾向。本節將先簡要整理目前關於海洋與靠海人群生活方式的討論，再說明能供性的分析取徑如何能展開不同的討論方式。

(一) 重思海洋特質

今日人文社會科學的海洋研究中一個重要的典範，是地理學家Steinberg和Peters (2015) 提出的「潮濕本體論」 (wet ontology)。他們反對過往認為

5 本文使用「靠海世界」來指稱靠海生活的漁民在日常實踐中展開的世界。這樣的取徑啟發自 Schnegg (2021) 關於奈米比亞郊區農民的氣候變遷本體論的分析。他從現象學的角度提醒「我們如何認知不只形塑我們知道什麼，還形塑了實際上存在什麼」(同上引：262)，並借用 Heidegger (1962[1927]) 的定義，指稱「世界」為一個相關聯的實體、任務與使實體對任務有用的同一性 (identities) 所組成的整體。依循這樣的思路，Schnegg認為要理解他人所身處的世界，可以關注三項重點：人在實作上如何使用其他實體、人與其他實體互動時的目的，以及前兩者所創造的關係網絡 (同上引：268)，而本文亦是依此展開關於靠海世界的分析。

海洋平凡、毫無特色的偏見（這類觀點尤其以法學家Carl Schmitt為代表），指出海洋幾項會使地理學在設想陸域空間時所預設的二維、固定邊界性質受到挑戰的特性，包含紊亂但又具有一定節奏的海浪，海水較土地快速的流動性以及持續攪動、漂移的特質，並引申流體力學中的拉格朗日描述（即一種以質點的流動路徑而非流場座標點來描述流體運動的分析方法）來理解海洋為由各種「流」（flows）持續重組，不能以固定的座標系描述而只能在移動的脈絡中掌握的動態環境。他們將這樣的觀點稱為潮濕本體論，並認為不只適用於海洋，更能作為地理學理解空間的物質性、流動性與量體性的新理論模型。幾年後，兩位作者再進一步提出「多於濕本體論」（more-than-wet ontology），以海上經驗多於海洋液態物質性的部分，包含固態的冰、空氣中的霧與海上的風，拓展地理學對於空間在經驗感受面向的設想（Peters and Steinberg 2019）。從單子式的觀點來看，海洋是海洋生物、泥沙、鹽等個體所構成，但從兩位作者提出的潮濕本體論與多於濕本體論來看，海洋是不僅止於液態的各種「流」（例如風、海流、河川輸沙等等）匯聚並持續重組的動態環境。潮濕本體論與多於濕本體論在地理學界的討論具有巨大的影響力，⁶以臺灣學者而言，洪伯邑、練聿修（Hung and Lien 2022）在他們關於海上政治邊界的回顧性文章中就將強調海洋物質性、時間性與動態性的潮濕本體論視為重思國家權力如何在海洋空間運作的重要理論推展之一；王驥懋（2022）也以潮濕本體論為反思地球政治中陸域中心偏見的重要理論基礎，並認為能為船舶治理、海洋保護區劃設等現實議題提供更深刻的觀點，他也將潮濕本體論的觀點應用於水下噪音政治，深化水下生物聲景快速變動的特性（王驥懋、錢克瑄 2022）。

事實上，地理學家用以重思或挑戰陸域中心偏見的海洋的動態性與不穩定性，在人類學的漁業研究裡並不稀奇，但在早期研究中多將其直接視為海洋的本質特性來展開靠海人群生活方式的分析。依據Acheson（1981）對漁業人類學的整理，早期以捕魚維生的人群為研究對象的民族誌中，大致可見幾項共通（但非普同）之處，包含：漁民往往集團（多以家人組成）出海並且內部強調平等主義、與盤商往往具有密切的關係等等，而這些特色在民族誌作者的解釋

6 亦可理解為地理學量體轉向的一部分，見廖昱凱、簡旭伸（2019）。

裡都與海洋的不確定性與風險（包含天氣與魚群的難以預測性）有深刻關聯，例如船長在海上航行時會比較願意聽船員的建議，是為了降低發生事故的風險；與盤商建立密切的關係，雖然部分是由於漁民沒有充足時間做漁獲買賣，但主要仍是因為漁獲價格會因為漁獲量的不穩定性或季節差異而浮動，因此需要建立密切關係以確保收購價格。McGoodwin（1990）也指出幾項世界各地的小尺度漁民的共通特質：他們最主要的生計來源即是海洋，在以他們為主的社群裡，捕魚往往貫穿文化的各個面向，並且他們在精神特質（ethos）上經常比陸地人群更強調獨立自主與挑戰性，而McGoodwin認為這項區別來自於他們的經濟活動面臨較高的風險：相對於漁民，陸地人群很少面臨每次去工作時都有可能失去所有具生產力的資本，包含生產工具（船、漁網）與生命本身的危險（同上引：29）。在臺灣脈絡中，相似的分析亦可見於王崧興（1967）的經典作品《龜山島－漢人漁村社會之研究》，他從漁民的帳本指出他們如何精於計算，也觀察到龜山島當地漁民大多講話直來直往，並認為這樣的特質「與他們的捕魚生活有關，因在海上作業時，要求動作快、機動、勇敢，而不容在時間上有緩慢的現象」（同上引：23）。王崧興在「文化對極性」分析中，指出當地個人主義取向的漁業生產與社區精神取向的宗教生活是互補的，因為「捕魚生活第一在技術上要『行』，其次是靠『運』」，技術由男人精進，老人與婦女則負責去廟宇燒香拜拜，以祈求好運，因此，家族也就是把此兩極端合而為一的單位」（同上引：137）。在此同樣可見到，漁獲的不穩定性成為了宗教活動的解釋。不過，Helmreich（2011）提醒，早期漁業人類學功能論式的解釋具有將海洋視為本體論上不可預測之物的傾向，這樣的傾向有其西方海洋想像的系譜，並且在這樣的知識生產裡，海洋往往成為功能論用以發展理論的「理論機器」，而海洋與人的具體互動則未被細緻探索。⁷

Steinberg和Peters（2015）主要以海洋的湧現性、變動性等物質性，挑戰將海洋視為無物的陸域中心觀點，Helmreich（2011）則提醒關注靠海人群生活方

7 當然，人類學關於海洋的研究並未停留在功能論傳統，在Dua（2024）近期的回顧文章中，即除了漁業人類學之外，還回顧了關於海洋領域所有權、海洋航運在跨國貿易中的重要位置，以及海洋相關基礎設施的研究。感謝一位匿名審查人的重要提醒。

式時研究者帶入自身關於海洋的危險想像的疑慮，這兩種觀點雖然在回應不一樣的「海洋偏見」，但都強調將特定的「海洋特質」本質化的危險。⁸但是另一方面，在田野現場同樣明確的是，多數漁民對於海洋確實具有特定認識，也會同意Acheson（1981）、McGoodwin（1990）、王崧興（1967）的一些說法，例如認為海洋是充滿不確定性的空間。因此，除了要小心關於海洋的本質化論述之外，本文認為還需要進一步去問，漁民真實經驗的海洋特質是如何構成的。尤其這樣的海洋特質顯然不只是一般想像的危險場域，從第一節的田野故事中就可以明確看到，海洋對於靠海村漁民來說意義顯然更加複雜，不只是難以預測的流動水體，也是讓他們「有錢賺」，能「自由」地生活的基礎，並且這些對於海洋的評價，並非單純出自海洋的物理性質本身，而是浮現自漁民與海洋互動的脈絡。

這帶出的是，要理解靠海生活，需要先從漁民的經驗脈絡出發，理解漁民的世界中海洋是什麼。目前已有不少關注人們如何與海洋互動的文獻，然而多數研究較執著於證成漁民或靠海社群有某種值得保存、記錄的「海洋文化」，或者能在當前環境治理的脈絡中凸顯在地社群重要性與主體性的傳統生態知識。這兩種討論方向在文化政治與環境治理上各自都有重要性，但在討論上，經常過度著重於各種「知識」的列舉，而忽略了人們經驗環境、生產環境知識，進而勞作自己的生活與身處的世界的過程的創造性，未能正面處理漁民所重視的海洋特質如何在人們的實作中浮現。

浦忠勇（2021）的《原蘊山海間：臺灣原住民族狩獵暨漁撈文化研究》即是一個著重於傳統文化紀錄的例子，他列舉整理了歷史文獻中原住民族關於水產生物的各種知識，包含肉質、棲息位置、宗教意義，和各族多樣的捕魚方式，以說明原住民捕魚技術、知識與相關宗教祭儀的複雜性，以及這些漁獵文化知識如何具有豐富文化意義而需要記錄保存。鄭螢憶、李侑儒（2024）主編

8 感謝一名匿名審查人協助釐清Helmreich（2011）在人類學脈絡中提出的批評與潮溼本體論對於陸地中心理論的挑戰之間的異同。此外，本文並非意在批判Steinberg和Peters（2015）、Helmreich（2011）的研究，反而正是因為留意到在理論家嘗試拓展人們對於海洋的理解時，仍有些「海洋特質」在靠海人群的生活中被確實經驗，因此希望更仔細關注這些「海洋特質」是如何在日常生活實作中確立真實性，來呼應上述學者的根本關懷，解放海洋蘊含的多重複雜性。

的《漁海共生：東北角到北海岸的漁村地名與日常》是另一個例子，作者群以地名為切入點，探索臺灣東北角與北海岸與漁業生活相關的文化，包含地方發展歷史、代表性水產品、特殊漁法漁具（其中當然包含最知名的牽罟）等等。在這本文集中，地名經常被視為在地（並且經常是過往記憶中的）生態知識的體現，例如李侑儒在後記中寫道：

這些海岸或海域的傳統地名，在在訴說著傍海而生的各族群經年累積的海洋知識，以及與自然環境和諧共生的用海智慧。……海岸傳統地名消失或遺忘的速度相當迅速，反映出居民使用海洋的機會減少，以及母語保存的問題。語言是文化的根基，本研究旨在傳承臺灣各地的海洋文化，自應致力於各族群母語和方言的保存和推廣，記錄各地獨特的語音和彼此之間多元共存的表現方式。另一方面，本研究也希望透過傳統記名的采風，及時記錄各地海洋地景的樣貌與故事，保存同世代人對於海岸環境的共同記憶。（同上引：210-211）

從這樣的說法可見到，作者群傾向將文化視為一種即將消逝的「傳統」，代表著世世代代與海洋互動累積的「用海智慧」，並因位於這些智慧核心的「傳統地名」逐漸被遺忘，嘗試透過記錄地名保存「海洋文化」。這樣的取徑，經常將漁撈實作與相關的知識塑造成需要重拾的懷舊對象，以喚起主流大眾對於傳統文化的關心，但也在此過程中將人們與海洋創造性互動的「海洋文化」描繪成靜態、彷彿物一般的實體。

以主要啟發自Berkes（2018）的傳統生態知識構框來回應環境資源管理議題的例子，則可以蔡政良（2022, 2023）對於阿美族水下獵人的研究為代表。⁹ 蔡政良的討論雖已不同於傳統生態知識討論初期的靜態觀點，但他大致仍立基在傳統生態知識的框架，細緻記錄都蘭阿美族人豐富的海洋生態知識，並區分為「海洋生態性知識系統」、「海洋社會性知識系統」以及「海洋文化性知識

9 浦忠勇（2021）也以傳統狩獵漁撈文化如何具有資源管理上的意義為一項論述重點，但著重於陸域山林的狩獵議題，對海洋資源管理的討論較少。

系統」，分別指涉關於海洋環境（包含魚類等生物、海岸地形，以及洋流特性等）、社會活動（包含水下獵人的社會組織、射魚裝備的分工製作，以及漁獲的交換與共食），和水下獵人的儀式與世界觀的知識系統（蔡政良 2022）。藉由強調動態性的構框，他除了關注傳統生態知識如何在環境與社會變遷之間變動，又如何使阿美族人能回應這些變動之外，也嘗試藉由傳統生態知識尋求更正義的社群共管機制。他在行文間，不時地強調海洋相關的知識如何證成原住民主體性，如「都蘭阿美族人對近海魚類的命名系統，再現了人對於魚的分類知識，而該知識系統具有文化差異以及與西方自然科學系統不同的視角」（蔡政良 2023：45）或「從阿美族人對於海岸地景的命名與意義，即可再現阿美族人對於海洋與陸地交會的空間觀，很顯然與臺灣主流社會中看待海岸的觀念不同」（同上引：59），以此帶出國家長期忽略在地社群環境觀念可能造成的問題，以及原住民的傳統生態知識如何可能是實現更正義的資源共管的關鍵。海洋資源管理確實是個重要的環境正義議題，但研究者為了證明原住民環境知識之豐富，難免將討論重點過度聚焦在魚的名字、海岸地名、海洋相關的祭儀等能確實列舉的知識，而將知識生產的過程簡單帶過。

雖然多數研究著重在列舉「傳統知識」，但已有部分研究著重於探究環境知識的生產過程。同樣運用傳統生態知識的構框以強調資源共管的重要性，吳映青（2019）探討南方澳漁民所謂「海路」，但「並不強調臺灣近海漁民等同於一個有特定族群文化為內涵的群體」（同上引：48）。她將「海路」視為在反覆的工作實踐中累積的技藝，比起漁民與海洋互動的知識本身，她更強調漁具漁法（「海路」一詞的直接指涉對象）如何中介人與海洋的互動，進而造就操用不同「海路」的漁民生成迥異的環境認知。另一個例子是呂欣怡（2022）對於離岸風電開發與近沿海漁民之間的衝突的分析，她並不從漁民具有的某種「傳統智慧」或者傳統生態知識出發，而是在環境衝突的脈絡中，找到時間觀作為合適的比較點，來彰顯漁民與海洋互動的技藝與風電政策的想像不同之處。為了與機械化的風機施工預期時程進行對比，文中描寫漁民活用時間以創造價值的技藝，且她聚焦的與其說是某種傳統生態知識，更接近一個個漁民與海洋長期互動下所摸索出的小技巧背後的創意。這樣的分析取徑著重的不是細數各種能客體化表述的環境知識，而是著重在人們如何富具創意地與海洋互動，進而生產知識並活出自己的生活。

本文延伸吳映青（2019）、呂欣怡（2022）著重於知識生產過程的分析，以能供性勞作¹⁰來概念化這些互動技藝。不同於去找到並列舉各種群體共有的、具有傳統文化價值的海洋環境知識，本文要呈現的是漁民如何在「去海」的活動中展開自己的生活，以及使這樣的生活成為可能的靠海世界。在這個過程中，漁民確實對於海洋環境有了深刻的掌握，但這些知識不必用以證成某種體系性的知識，反而這些知識的運用或如同本文接下來即將提出的，這些對於環境能供性的勞作，反映了漁民對於生活與環境的創造潛力，並且是探究當代靠海生活方式的關鍵。

（二）能供性的取徑

能供性，或譯為環境賦使，是環境心理學家James Gibson（1979）所創的詞彙，用以指涉環境能供給動物使用以生存的性質。他特別提出這個詞是為了強調，這樣的性質是環境在與動物的具體互動關係之中供給動物的，能供性涉及觀察者對環境的感知，「去感知它們即是去感知它們能供給什麼」（同上引：127）。能供性涉及從環境提取資訊的注意力（attention），因此任何一件物（thing）、一項實質（substance）的能供性都依據觀察者而具有很大的變異性，沒有辦法被抽象、客觀量測。一個物種的棲位（niche）即可視為一組環境之於該物種的能供性——棲位與棲地不同，指涉的不是預先劃定的空間，而是動物在與環境互動、適應中找到的生存方式，且藉此在生態系統裡有了自身的位子。由此來看，對於該物種來說生態棲位是真實的，但也是牠與環境的主觀互動的產物，這樣的性質引出了後來廣為流傳的經典段落：

一個關於環境的能供性的重要事實是，它們在一個意義上是客觀的、真實的、物理的，而非如一般常預設主觀的、現象的、心理的價值或意義。但確切來說，一件能供性既不是一個客觀性質，也不是一個主

10 這樣的觀念啟發自McCall Howard（2017）的民族誌，但McCall Howard自己在書寫上並未直接扣合這兩個詞彙。論及能供性時，她使用的動詞大多是「建立」（develop），之後再將這樣的過程與勞動（labour）並列，來強調「人們建立能供性的行動是勞動過程」（human actions in developing affordances are labour processes；同上引：42）。

觀性質；或你也可以說它兩者皆是。能供性跨越了主觀—客觀的二元論並幫助我們了解此二元論的不準確性。它同是一件環境的事實與一件行為的事實。它既物理又心理，卻又兩者皆非。（同上引：129）

也就是說，能供性不是「客觀」的，因為是以觀察者為參照（with reference to an observer）而形成，但也不只是觀察者的「主觀」經驗，因為動物確實在生態中找到了自己的棲位。人類學家Tim Ingold（2000）即是在此找到了他認為可以突破文化—自然二元的切入點，並在知名的《環境的感知：有關生命、棲居與技藝的論文集》（*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Essays on Livelihood, Dwelling and Skill*）中嘗試整合社會文化人類學與生物人類學，以「人也是一種生命與再生產皆依賴於其他物種與環境非生物性要素的有機體」（同上引：2）出發，參考Gibson原本用於理解動物與環境關係的能供性理論，發展他對人與環境關係的論點。Ingold批評過往的研究往往認為人們所認知的環境是文化建構的產物，彷彿文化掩蓋（cover up）了人們所認知的環境，但是人們的環境知識並非來自獨立於環境之外的主體內在，而是立基於人們已經先棲居於環境之中並與之持續互動的事實，文化的傳承則應如同說故事（story-telling），是人與環境互動的注意力引導而非一種掩蓋，¹¹並且這樣的注意力亦是一種技藝。這樣的觀點基本上就是在人也是一種動物的基礎上，以能供性「既主觀又客觀」的性質為發想，將以往預設為文化建構的「自然」視為人們與客觀環境互動而生的能供性，即使這樣的「自然」具有主觀性質，此互動中產生的自然概念並不能化約為文化建構。¹²

11 Ingold（2000）批評過往的研究繼承西方笛卡兒傳統以來的心物二元論，提出將沉浸於環境或者生活世界（lifeworld）視為人的存在無可迴避的條件的「棲居觀點」（dwelling perspective），他從有關澳洲、極地和熱帶雨林狩獵採集者和非人物種甚至地景的親緣觀念的民族誌材料指出這些概念並不是人的文化投射，而是來自人類沉浸於環境之中的生活經驗，且這樣的環境感知並非狩獵採集者所獨有，而是人類根本的存在狀態。不過，本文處理的漁民，對於工作的空間（海洋）與居住的空間（陸地聚落）之間有明顯的區隔，因此未從棲居觀點來分析漁民與海洋的互動關係。

12 感謝一位匿名審查人提醒，Ingold對於Gibson（1979）提出的能供性概念亦有所批評。Ingold在2000年以後著重於西方本體論的再思考，大致而言，他將世界視為流變（becoming）的交織域，運動和關係先於實體而存在（見Ingold 2006, 2008），在這樣的觀點下，Gibson的能供

然而，上述觀點仍有幾項需要注意。首先，Gibson (1979) 的能供性理論強調環境仍然優位於個別物種，¹³但這樣的觀點難以套用到現代人類與自然環境的關係，或者需要將「環境」擴及人造技術物。此外，Gibson的原文中，在觀察者與實質的關係上賦予了人類與動物不同的地位：人類改造了環境的實質，而非只是如動物在生態中找到棲位、發現能供性。¹⁴也就是說，人的環境能供性不只是「感知」結果，還可能涉及改造物質條件的過程。總結而言，對於人與環境關係的理解上，Ingold確實有其創見，但仍待解決的是在這樣的架構中納入技術物的考量，並更適當地定位人類活動對於環境實質的影響。

McCall Howard (2017) 依循能供性作為分析方法，但進一步強調人從環境中感知能供性的過程裡的身體與工具施作，視之為一種帶有意圖 (intentionality)¹⁵的物質轉化 (metabolism) 的勞動過程。¹⁶她以扎實的民族

性概念太著重於實體個體本身而未能捕捉到背後構成實體的關係。這涉及一整套關係性的本體論，但就本文對於田野現象的分析來說，實體本身的物質特性仍然是重要的，而McCall Howard (2017) 的取徑更能捕捉能供性的生成如何涉及環境實質的物質特性和人類勞動實作的糾纏。因此，本文未從Ingold後續的理論展開分析，而是著重於他在2000年以前將能供性帶入人類學分析的貢獻，本文後續關於Ingold和Gibson理論的釐清亦是立基在實質之於能供性的重要性（而非Ingold後續關心的，環境實質背後的交織流變）展開。

- 13 Gibson (1979: 129) 的理論中，「有機體依賴他的環境而生，但環境並不依賴有機體以存在」。
- 14 Gibson (1979) 提醒人造物終究需要來自自然，將人的社會世界與自然世界二分是一種謬誤，但他也接著提出「只有一個歧異的世界 (There is only one world, however diverse)」，並且所有動物都居住其中，即使我們人類已經改變之以配合我們的需要」（同上引：130）。
- 15 一般而言，在現象學脈絡裡intentionality多譯為「意向性」，但「意向性」這個詞一開始是為了翻譯胡賽爾在心智能力上對intentionality的討論，因此較具有即時、直覺感。然而，McCall Howard (2017) 的用法裡強調對這樣的意向性背後的政治經濟脈絡進行分析，也就是說直覺的意向性背後應有所圖，因此本文譯為「意圖」。
- 16 McCall Howard (2017) 引用的是馬克思對於勞動過程的經典定義，即勞動「首要上是人和自然之間，人以自身的活動來中介、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轉化過程。人自身作為一種自然力與自然物質相對立。他動起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頭和手，以將自然物質調整為符合自身所需的形式。他作用於身外的自然並改變它，也與此同時改變他自身的自然」（Marx 1990[1976]: 283）。關於將環境能供性的建立扣連到馬克思的勞動概念的理論推論過程可見McCall Howard (2018)，大致而言，這是為了解析人們的漁業勞動背後的政治經濟結構力量，以將資本主義的影響帶回Ingold (2000) 以降聚焦在個人與環境的互動本身，或者從各種理論來建構人與環境的內在關聯，卻反而忽略了這些互動如何關係到各種社會關係的環境人類學取徑。例如在McCall Howard (2017) 第六章，她以詳細的田野故事說明海洋之所以被漁民認為「危險」，是因為漁民出於生計需求而在不見得適合出海的日子出海捕魚進而發生事故，由此來說是在政治經濟結構影響了漁民與海洋互動的意圖的背景下，海洋在漁民的實作中成為「危險」的地方。感謝一位匿名審查人提醒釐清此項理論脈絡的重要性。

誌材料指出，對於蘇格蘭龍蝦拖網漁民來說，漁場是透過技藝與工具在海洋「做」出來的（ground is ‘worked’），人是在透過船隻、網具與GPS等技術物協作捕魚活動的過程中感知海洋，並且在這樣的感知中發現漁場，以此而言，漁場「同是一件環境的事實與一件行為的事實」（Gibson 1979: 129）。這反映在，捕魚活動一般而言是對於海洋資源的取用，但漁民往往認為自己投入的勞動是在增加漁場的生產力，並且能以確實的經驗證明某一處的漁獲量如何在自己的影響下增加（面對漁獲量逐漸減少的事實時，則會認為破壞漁場生產力的總是其他漁民）。在這樣的框架下，能供性並不只是觀察而得的，還需要實際運用工具投入勞動，這些勞動客觀改造了環境的實質，但同時改造的成果仍然是以觀察者或勞動者為主觀參照。

本文的論點發想深受McCall Howard（2017）的民族誌啟發，除了因為她在理論上將人的活動的物質效應帶入能供性的構作過程，而不只是將能供性視為注意環境的結果之外，還在於她的觀點和我的田野經驗有許多可呼應之處。尤其她將多種技術工具的使用帶入能供性的討論，並且強調人們利用這些工具主動構作海洋能供性的能力。在後續章節裡，本文將以Ingold（2000）取自Gibson（1979），後經McCall Howard（2017）調整後的能供性理論為取徑，從漁具漁法的運用如何構作了漁民所感知的海洋開始，呈現海洋如何在漁民「去海」的實作中浮現，漁民又如何透過與海洋的互動活出自己的生活。但在此之前，下一節將先交代田野材料的取得過程，並對靠海村的發展脈絡進行基本描述。

三、田野歷程和場域概述

本論文的研究材料，主要來自2022年8月至2023年8月期間，我在雲林一個沿海聚落靠海村所進行的田野觀察與訪談，並視情況補充我對於雲林沿海其他聚落漁民的觀察。我初次到訪靠海村，是大學時期修習田野課程來到此處實習，那時我的研究主題聚焦在養殖漁業（尤其魚塭養殖），但仍對於當地近沿岸漁業深具活力的氛圍印象深刻，研究所時期也因兼任呂欣怡教授的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助理而多次拜訪靠海村。在確定以人與海洋的互動為論文研究

方向以後，我也曾拜訪其他沿岸聚落，但或許是出於先前多次拜訪所累積的好奇，最後我仍選擇以靠海村作為主要田野地。需要說明的是，在這一年內我並不是每天都待在靠海村，其中直接居住在當地的期間僅有2022年5至6月，在這之前主要以例行性拜訪方式進行多次短期田野，實際田野日數僅97日。¹⁷之所以這樣進行田野工作，是考量到漁業生活受季節影響很大，在一兩個月內密集進行的田野工作所能觀察到的生活景況將無法把季節因素考慮進來，但現有研究資源亦不足以負擔全年度的田野工作，因此選擇在有限的時間與長期的關注之間折衷，拉長時間尺度、定期回訪累積觀察。我在田野期間的主要報導人共36名，皆為養殖和捕撈漁業相關從業者（包含水產盤商、製冰業者等）或其家人，資料蒐集以日常互動的紀錄為主，在與每一位報導人初次見面時皆會表明自己是來進行漁業活動、人海關係相關研究的田野工作者，並且在記錄當下與對方確認內容，僅有一次進行預列訪綱、長時段一對一的深度訪談。¹⁸

在人與海洋的關係上，依據能供性理論從人與環境的具體互動出發，我花了很多時間了解漁民在養蚵、捕魚等各種海上工作的細節，關注他們在其中強調環境與生物有什麼樣的物質特性：例如潮汐漲退的週期、魚群的可預期性與不可預期性、蚵仔的習性等等，並且記錄對方所使用的漁船與漁法類型以作為參照。至於海上活動的實際情況，受限於國家海洋與漁業管理法規的限制，我沒有船員證無法隨漁民出海，因此實際出海而得的田野材料較為零星。2022年末開始，海巡與靠海村漁民的關係惡化，更是使得出海進行參與觀察難以達成。對於此方面的限制，我一方面花了許多時間在漁港觀察漁船出入港的時間與港內準備工作，也在港內參與漁船「清網」的工作；另一方面在聆聽漁民描述海上作業情形時，特別留意他們表述的方式，依循言說現象學取徑（Mattingly 2010）的建議，視言說敘事為一種行動，關注事件如何在敘事中被構框，也就是人們如何說、為何說、在什麼樣的情境說，除了話語內容外也對言說現象本身所調用的敘

17 包含：2022年8月19日至29日，計11日；2022年9月8日至9日，計2日；2022年12月9日至23日，計14日；2023年2月13日至18日，計6日；2023年3月9日至16日，計7日；2023年3月31日至4月6日，計7日；2023年5月3日至29日，計27日；2023年6月9日至28日，計20日；2023年7月17日至18日，計2日；2023年8月29日，計1日。

18 本文直接提及的報導人，皆為捕魚、養蚵或者兩者兼營的漁民。

事架構和風格等進行分析。由此來說，除了漁民在言說中描述的內容本身之外，漁民如何言說本身，就充滿了可以進一步分析的可能性。

由於這樣的田野工作歷程，本文的分析方式相當著重於展開人們的言說與實作中各個細微之處的內涵。為了避免在強調田野現象的細微之處的同時失去宏觀的視野，接下來將先對靠海村的生活進行概括式的描述，使本論文所描寫的細微現象能定位到具體的背景脈絡，避免在分析上失去定錨點。

今日仍有許多居民從事漁業與水產交易工作的靠海村，緊鄰著臺灣海峽，鄰近的漁港雖然並不大，但是停靠的排筏和漁船數目超過三百艘。雖然也有些居民經營早餐店、便當店等滿足基礎生活需求的產業，也有些居民是到鄰近的市區工作（大多是女性），但大多數居民以刺網捕魚、海上蚵仔養殖，以及魚塭養殖為主要經濟來源，有些漁民亦兼營水產行。這些不同生產方式之間並不互相排斥，更常見到的是兼業，在我主要的幾個報導人中，就不乏兼營魚塭與捕撈漁業、兼營蚵仔養殖與捕撈漁業，或甚至三者都兼做的漁民。不過，有關專營魚塭養殖的居民，他們的生活技藝更多是對魚塭環境的細緻觀察與調整（如劉如意、呂欣怡 2019；鄭肇祺 2021），而非與海洋環境的互動，故不列入本論文的討論對象。事實上，整體而言靠海村村民所擁有的魚塭地較周邊聚落少得多。

靠海村漁民的海上勞動大致都在臺灣海峽海域進行。有關臺灣海峽的環境，詹森（2018）主編的臺灣海洋研究教科書中已整理許多相關研究，此處僅摘要幾項對於靠海村漁民來說較為重要的環境背景資料。首先，相較於東海岸，臺灣海峽的水深較淺，雲林外海更有水深約在30公尺內的彰雲砂脊。由於彰雲砂脊較高的地勢，海流從水深約100至200公尺的澎湖水道進入臺灣海峽後分為由西邊繞過的主流與越過砂脊的支流，這代表雲林近海不只水深較淺，又有湧升流帶來海底的營養鹽，能吸引魚群，有利於捕撈漁業。此外，位於臺灣海峽中段的雲林海域還有一項特徵，那就是漲潮時海水由臺灣海峽南北兩側湧入較淺海域，造成滿潮與乾潮的潮位之間較大的潮差（約2公尺以上），且依據漁民的觀察，冬天的潮差往往比夏天的潮差大。滿潮與乾潮之間水位的劇烈變化以及漲退潮時快速流動的海流，是漁民對我說明雲林海域的環境特性時會強調的重點之一（見第四節）。

或許是由於鄰近這片富具生產力的海域，靠海村出產的水產種類很多，除了海上養殖的蚵仔，以及近沿海捕撈漁獲如紅邊、¹⁹三牙、²⁰午魚、²¹白鯧、²²沙腸仔、²³烏魚²⁴等，還有在近岸捕捉的黑格、²⁵螃蟹、香螺，以及冬季在河口處撈獲的鰻苗。漁民從海上帶回的水產，早年大多交給盤商收購，今日則大多自行以網路和通訊軟體銷售，或者由週一至週六下午來到村裡的貨運車，運送到垵仔頂、前鎮等較大規模的魚市場委託販賣。這些豐富的水產，是靠海村的漁民今日能自豪地說都市裡的工作也沒有賺得比較多的原因之一，但是以前靠海村並不是這樣的。依據村裡七八十歲長者的回憶，在他們小時候靠海村「討海」的人很多，但生產的水產沒有現在這麼多，以養蚵為主，也會依據季節到沙洲上撈虱目魚苗、在河口撈鰻苗，或者冬季圍捕烏魚，後來討海的人一度越來越少，是到了最近幾年又越來越多，水產種類也比以往更多元。

這涉及的是交織於靠海村的城鄉流動、技術發展與勞動型態變化歷史。在我所接觸到的多數報導人回憶所及的1960至70年代，那時動力漁船尚未普及，漁民主要的海上生產活動是在近岸養殖蚵仔，會到外海捕魚的漁船不多，今日六七十歲左右的村民在回憶過去時，大多都還可以一一列出這些漁船。由於那時還沒有今日已經普及的衛星定位、魚探機、起網機、洗蚵機等技術工具，海上勞動的危險性與身體的疲累感更強，又因為冷凍、運輸技術不便捷，水產能創造的價值有限，要能養家糊口，需要更積極投入勞動。一位報導人與我說，那時無論適合出海整理蚵棚的潮汐漲退時刻多早，甚至是在半夜，老一輩都一定會出海，並且地方上流傳一句俗話：「蚵鉞仔插上壁，腹肚貼胛脊（ka-tsiah）」，²⁶意指只要夏天蚵仔收成完，鉞蚵仔（tshiam ô-á；剝開蚵殼、挑出蚵肉）的工作結束、蚵鉞仔收起來之後，就得等著餓肚子。這樣的說法或許有

19 鬚鯛屬（*Paraplagusia*）的魚種，有的漁民稱之為皇帝魚或比目魚，但需要留意的是，一般所謂比目魚或皇帝魚在分類上指的是鰈型目，其中魚種繁多，紅邊只是其中一類。

20 紅牙鰽（*Otolithes ruber*）。

21 指馬鰾科（*Polynemidae*）魚種，靠海村較常見的是多鱗四絲馬鰾（*Eleutheronema rhadinum*）。

22 銀鯧（*Pampus argenteus*）。

23 亞洲沙鯪（*Sillago asiatica*），也有人稱之為kiss魚。

24 鰻魚（*Mugil cephalus*）。

25 黑棘鯛（*Acanthopagrus schlegelii*）。

26 田野筆記2023/03/12，括號內的標楷體引述是對方一個字一個字要我記錄下來的。

些誇飾，但靠海村的人都很瘦，確實也是我分別從熟稔的，在1980年代嫁到靠海村來的幾位主要女性報導人，在說起對於靠海村的第一印象時，不約而同提到的經驗。

當時海上勞動所能創造的收入有限，收入在一年之中的分布也不平均，因此除了海上勞動之外，不少漁民兼做其他工作，或者會在冬天時到工地打零工，許多人也就這樣一去不回，在外地生活。尤其，與當時仍然相當辛苦的漁業生活相對映的，是1970至80年代臺灣製造業的快速發展以及都市的擴張，在這樣的對比下，對於當時的年輕一代來說，傳統的漁業往往不是工作的第一選擇。親身經歷那個年代的漁民，常提到還沒有洗蚵機的時候，蚵仔都要用手洗，年輕人必須搬得動每籃動輒上百公斤的蚵仔，這樣的勞動型態讓幼年時期就體會到辛勞的年輕一代，幾乎沒有人會想要留下來做這種工作，大部分在成年之後就到都市找工作。

不過，在與都市受薪工作交會之下，反而漸漸出現青年人重回漁業生活的傾向。這和他們出外發展並不一定順遂的經歷有關，但也不僅出自對於主流工作體制與薪資的不滿，還因為靠海生活的方式也在技術變遷下有了改變。靠海村漁民自己會強調的幾項轉變，包含政府對於漁業相關輔導政策的推動（見莊英章 1981），以及在這樣的基礎上改善的生產工具，尤其一般稱為「籤仔」

（tshiam-á）的玻璃纖維強化塑膠快艇；還有在相近的時期，開始出現大幅拓展養蚵範圍的「浮棚仔」（phû-pènn-á）養蚵方式（林志德 2008）。雖然無法化約為上述變化的結果，但據幾位主要報導人的說法，在1990年代後，靠海村的經濟狀況確實開始改善。在2000年代以後，網路通訊的便捷與各種保鮮技術的普及，更是使水產能創造的單位收入增加，而這些轉變，使得靠海生活對前往都市打拚卻以心灰意冷的結果告終的人們來說，重拾小時候因為辛苦而不願意繼承，但現在勞動型態已大不相同的漁業工作，成為一種可以選擇的生活方式。尤其近年都市工作的薪資體制，對於年輕人而言已不再如1980年代一般有那麼多「賺大錢」的機會，還可能需要更多錢支持都市生活的日常花費，使得越來越多在靠海村長大的年輕人，選擇留在家鄉從事「有錢賺」的漁業勞動。

本文所要描寫的，即是在當代臺灣的經濟發展脈絡與漁業技術情境下，漁民如何與海洋互動，進而活出自己的生活。我將透過靠海村的漁民捕魚與養蚵的實

作，來檢視漁民如何與海洋互動、海洋之於靠海生活又具有什麼樣的意義。我將先說明漁民藉以理解海洋、進而利用之的「經驗」如何浮現自具體的互動脈絡，接著分析漁民對於潮汐、海氣象和海洋「時間性」的經驗，如何涉及漁具漁法、漁船與蚵仔養殖技術，說明在這些與海洋富有創造性的積極互動中，漁民的工作安排並不是簡單「受限」於一般認為是限制的各種海洋特質與其物質韻律，反而海洋之於漁民的意義正是在漁民「去海」的創造性實踐中浮現。

四、經驗與海洋的能供性

讓我先從捕魚活動開始。從蘭姐的說法來看，顯然海洋有一項重要的意義，那就是能從中捕撈出漁獲，而雖然漁獲來自海洋，但是漁民清楚知道海中各種水產生物在時間與空間上的分布並不均質，不同魚種棲息在不同水深、洄游性的魚類有其汛期，海底地形與水流的交互作用也會影響一地的魚群豐富程度，要了解這些，才能從海上帶回豐碩的漁獲。當時冬天，蘭姐的丈夫明輝哥依著季節與我說起，從入秋以後到過年的午魚都「對時」（tioh-sî），正當肥美、是適合去捕撈的時候；三牙則是農曆年後三個月左右「大出」（tuā-tshut；盛產），並且這三個月的漁場不一樣，前幾個月在北邊外海，後幾個月則要到較靠西南側的海域去；抓紅邊的漁場位置與三牙近似，但「大出」的時候則是農曆三到五月。然而我詳細記錄下這些之後，他卻補了一句：這只是一般認知，以他的經驗來說，也不是季節到了就會豐收，例如紅邊常常只會集中在一兩片流水（潮汐漲退），²⁷過了之後抓到的量就少了。

「討海最重要的就是兩個字，經驗」，²⁸明輝哥順著提起經驗的重要，並且認為「經驗有沒有到」是自己與原本住在內陸的漁民的不同之處——在「內山」（lāi-suann）²⁹長大的人不熟悉這裡的海洋，對於水流的特性以及現在和過去的地形都不了解，只能看著別人去哪裡放網就跟去放，放了網也不理解為

27 「片」是漁民常用以指涉潮汐漲退的單位，一片流水即是一次潮汐漲退。

28 田野筆記2022/12/20，括號內的標楷體引述為當下速記。

29 指內陸地區，在靠海村的語境下用以與作為在海邊長大的「海口」人對比。

什麼網子要放在那裡；對比來說，在海邊長大的「海口」（hái-kháu）人，從小看著或跟著長輩「去海」，就會累積經驗、懂得觀察環境，尤其以前小型的漁船與排筏還沒有裝置太多電子儀器，觀察水流、地形與天氣的技巧更是重要。他認為，即使現在漁船大多配有衛星定位儀、測深儀等儀器，有的漁船也有裝魚探機，但要捕到豐碩的漁獲，主要還是靠經驗。

經驗不足不只可能捕不到魚，還可能發生危險。有一次明輝哥出海時剛好跟在一位住在內陸村落的漁民的船後面，結果一出港就看到對方也許是發覺水流太急，想要馬上折返回港，卻撞到養蚵的「浮棚仔」翻船了。他說這就是因為「看不對」潮水，路過蚵棚時，一定要讓船頭順著水流，從側面開過去，那艘船就是因為想要原路折返，所以才會翻覆。所以，要會「看」潮水，注意到危險就要想辦法避免，很多人出海發生危險都是因為「經驗不到」，不知道危險性，也不知道水流之後會怎麼走或者有沒有浪，不像他們「看得懂」。

具體而言，雲林外海漲潮的水流是由南往北流，那麼吹北風時，漲潮的時候風向逆水流的方向，就比較會有浪；而退潮的時候水流是由北往南流，北風順水流的方向，所以比較不會有浪。更仔細來說，由北邊來的「北浪」（pak-íng）跟由南邊來的「南浪」（lám-íng）的力道也很不一樣。北浪主要位於表層的「水面浪」（tsuí-bín-íng），雖然起伏明顯，但力道比較軟，不會讓船隻上的人感覺到太大的衝擊力；南浪則是水面上不明顯、但下水流很急的「貼底浪」（tah-té-íng），力道就很硬，可能水面上看起來沒有什麼起伏，但船隻實際上會承受很強的衝擊力。有颱風來，則可能會有「南趯」（lám-sô），這種一陣一陣的、波浪之間距離相隔較遠的浪，會讓漁船有一再被倒拖、拉回來「趯來趯去」（sô-lài-sô-khí）的感覺。

除了要會「看」潮水，還要會看天氣變化的預兆。明輝哥說起自己有一次去北邊放網抓三牙，第一次在退潮時起網只抓了七斤多而已，他覺得這樣不划算，就先在鄰近漁港下貨，打算趁漲潮再放一次網，但一出港就看到西北邊的天空霧霧的，心中還在想著不知道等一下會不會起風，結果網子放一半突然有一陣涼風吹來，他就知道狀況不對了，趕緊起網要回港，不料網子才起了三分之一風浪就來了，最後只得放棄下了一半的漁網，先趕緊將船開回漁港。「討海不是像在陸上，車壞了停路邊就好」，所以要知道不要去冒那個險，明輝哥

總結道，就像他爸爸一再叮嚀他的，「討海就是一輩子不能發生一次錯誤」。³⁰這樣的說法相當能呼應一般認為海洋充滿不確定性的認知，但明輝哥在對我說這些時，比起強調漁獲量的不穩定性和海上勞動的潛在風險，更像是要說明與海洋互動的經驗如何重要，以及這樣的經驗如何使他能不同於不熟悉海洋的人，將海洋化為能安全帶回豐碩漁獲的地方。

雖然在靠海村長大的明輝哥自認對於海洋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年紀接近六十的他，實際捕魚的資歷大約只有二十年。他養蚵的父母親原本並不期待他留在家鄉，但十多歲時父親生病，母親希望他留在家裡幫忙照顧，所以他並沒有去讀大學，而是先繼承家裡的養蚵工作。不過由於父親捨不得他做辛苦的養蚵工作，反而為此額外煩心，因此他大約十八歲就出外工作，雖然仍經常回家，但是直到四十歲才開始捕魚。後來我從他的好友老虞口中得知，明輝哥剛開始捕魚時也是抓不到什麼魚，那時經常向老虞討教，拿著紙筆逐一記下當時已捕魚多年的老虞所認知的漁場位置在東經、北緯幾分幾秒。³¹不過老虞也說，明輝哥後來也逐漸累積了經驗，摸索出自己一套捕魚的方法了。由此可知，明輝哥對於海洋深刻的了解，雖然也涉及一些地方上廣泛流傳、可以系統性表述的知識（例如漁獲的季節與大致的漁場位置），但在實際操作上，主要還是依據與海洋互動的經歷之中累積的經驗。

由於經驗是在每個人「去海」的歷練中累積的，在逐漸熟悉田野之後我也發現，漁民們對於如何與海洋互動——或更具體而言，怎麼樣才比較捕得到魚、怎麼樣才能安全出海與回岸——看法並不總是那麼一致。例如，雖然漁民對於漁場位置有一定的共識，但每個人認為能捕到魚的確切下網位置並不相同，且都各有一些自己認為容易捕到豐碩漁獲的地方。又例如在起網的時機方面，阿榮就認為潮水流動得越快抓到的魚越多，水流的力道軟下來的時候就抓不太到，但明輝哥並不這麼認為，並說在大潮的時候，反而在滿潮當下起網比較會抓到魚。為何對於同一片海域的感知會有這樣的差異，並且歧異的感知對

30 田野筆記2022/08/25，兩段括號內的標楷體引述皆為當下速記。

31 現在漁船上大多都有配置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全球定位系統），漁民們經常直接以北緯、東經幾分幾秒來表述海上位置。

於每個人來說都是有用、有效的，能作為安排「去海」的時機、目的地與作業方式的依據？前述Gibson（1979）的能供性理論提供了一個有用的框架。

能供性來自對環境的感知，並且需要觀察者從環境提取資訊的注意力（attention），這相當能呼應以明輝哥為代表的漁民對於「經驗」的強調。「去海」帶回的漁獲可視為海洋之於靠海生活的漁民的一種能供性，但要安全帶回豐碩的漁獲，需要在實際「去海」的經歷中累積的經驗，以懂得觀察海洋並與之互動，知道哪裡或什麼時段魚群多、或者能辨識風浪來臨前的徵兆。此外，能供性是以觀察者為參照的，即使並不「客觀」，但對於觀察者而言具有真實的效果，這可以對應到的是，即使不同漁民對於如何獲取豐碩的漁獲有不一樣的看法，但對每個漁民來說，出於自己經驗的看法都是確實有用的。

與Gibson對注意力的強調相似，在漁民對經驗的強調裡，「看」是一條重要隱喻：他們強調要會「看」流水、「看」變天的預兆，或者「看」潮汐漲退的速度。在這些說法裡，「看」都不僅止於視覺上的看清楚（其實明輝哥的眼睛不好，散光兩百度，還有老花，不過他並不認為這會影響到他的海上作業，他也只有看衛星定位儀、測深儀等儀器的時候會戴眼鏡），而較接近於知道注意力要放在哪裡，以及對於環境資訊如何理解進而運用的能力。然而，不同於Gibson或者大量參考Gibson理論的人類學家Ingold（2000）在棲居觀點（dwelling perspective）中強調的人與環境交織，在明輝哥說要會「看」的時候，我感覺那不是一種「融入環境」的意思，而是有意保持了觀視的距離。從明輝哥在表述「南浪」和「北浪」的差異時，是以他在船上的感覺說明來看，這樣的距離或許是因為，漁民終究是身在漁船上，透過漁網等工具與海洋互動（McCall Howard 2017）。

也就是說，雖然「經驗有到」的漁民能「看」出海洋豐富的能供性，但能供性浮現的過程並不只涉及Gibson（1979）所強調的注意力，還涉及各種工具的運用。吳映青（2019）在南方澳漁港的觀察即發現，對於討海人而言，漁具漁法不只是捕撈工具，也是漁民以討海技藝與海洋互動、建構對海洋環境認知的媒介，並且使用不同漁具漁法的討海人，往往對同樣的流水狀況有不同的評價。此外，我雖以漁民強調的「看」來表述海洋之於靠海生活的能供性浮現的過程，但如McCall Howard（2017）的重要提醒，應將能供性視為勞動

投入的結果，是在實際互動之中勞作出來，當漁民說要會「看」的時候，對於環境的觀察當然也並不真的只是用看的，而是要實際「去海」，並且「去海」是為了帶回各種能轉化為收入的水產。承接McCall Howard (2017)、吳映青 (2019) 的發現，本文接下來從漁具漁法開始，進而帶出漁民感知海洋、累積經驗、而後再對海洋有更多認識的過程中如何涉及各種工具的具體運用，海洋又如何靠在靠海生活的經驗以及這些工具的使用之中，被漁民感知為帶有不確定性但又能安全帶回豐碩漁獲的地方。

五、感知海洋的漁具漁法

漁民在不同的時機，對於不同的目標魚種，會使用不同的漁法。大致而言，靠海村的漁民所使用的漁法可分為三種：「浮綾仔」(phû-lîng-á)、「沉綾仔」(tiàm-lîng-á)與「現流仔」(hiàn-lâu-á)。³²所謂的「浮綾仔」即流刺網，是讓配有浮具的漁網浮在淺水層隨潮汐漲退漂流，如果要抓白鯧，大多就是用這種方式。如果要抓的是紅邊或三牙，由於棲息的水深較深，則要用「沉綾仔」，也就是讓網子沉在較深的水層，不過這樣容易網到海底垃圾，造成網具清理上的不便甚至毀損，因此不少人會在漁網下方加重物，以類似定刺網的做法，避免漁網隨潮水移動太遠、網到太多垃圾。以「浮綾仔」和「沉綾仔」的區別來說，對於冬季的主要魚種如午仔、烏魚，漁民大多使用「浮綾仔」來抓，而夏季的主要魚種如紅邊、三牙，則大多是使用「沉綾仔」。另外一種漁法「現流仔」，與前面兩種的區別不在放網的水深，而在下網、起網的時機，前兩種網具在海上漂流的期間較久，但「現流仔」是抓準潮水漲到最高點，水流力道開始軟下來的時候下網，等潮水開始退的時候馬上起網，這種漁法作業期間短，帶回的漁獲新鮮，且比較不會網到可能傷害漁網的垃圾，但是能抓到的魚種相對有限，像紅邊就較難以「現流仔」抓到。

32 hiàn-lâu-á此一表述在靠海村的日常語言中，大致用以指涉兩種內涵，我分別以「現流仔」與「現撈仔」書寫，「現流仔」指在當下那片潮水下網、起網的漁法，「現撈仔」則泛指當天帶回的任何漁獲。

這些漁法對於漁民而言，雖然有熟悉程度之別，但不太涉及身分認同，且在實際運用上，漁民往往還會依據對於當下的目標魚種習性的了解來調整合適的放網時機與水深。以靠海村漁民會當作主要目標的魚種來說，冬季洄游到臺灣海峽的烏魚具有突發性，並不是像白鯧、三牙等棲居在臺灣海峽的魚類，隨時下網都有可能抓得到，而是要趁在海上看到洄游的烏魚群時趕緊下網，才有機會捕獲。午魚雖然四季都見得到，但是冬天的午魚較多也較為肥美，並且還要考慮海氣象條件，不少漁民都說在有浪的日子比較容易抓到午魚，且雖然通常使用「浮綾仔」抓午魚，但若是抓比較大隻的「竹午」（tik-ngóo），³³放網的水深就不能太淺。水色和濁度也有差別：要抓到大量的白鯧，就要趁海水的水色像洗米水那樣霧霧的時候去放網，但如果是三牙，則要在海水清澈的時候比較抓得到。最後，有些魚種的活動時刻比較特定，例如紅邊就被漁民們認為是晚上才會出來活動，所以不同於一般「沉綾仔」下網後等待約一至二小時的作業方式，漁民們多會於黃昏下網，放置隔夜，等到凌晨再來起網。³⁴

對於不同目標魚種，除了會使用不同漁法之外，漁民也會使用不同的網具，區別主要在網具的層數與網目大小。例如，烏魚的活動力強，比較會拉扯漁網，因此捕烏魚的「烏綾仔」（oo-ling-á）是三層網，外面兩層網目比較大，大概一尺，讓魚游先進來之後再用網目3.3吋的主要漁網套住。「三牙綾」（sann-gê-ling）和捕捉沙腸仔的「沙腸綾」（sua-tng-ling）則是單層網，前者網目2.5吋，後者由於沙腸仔體型較小，網目也較小，以前大多是用1.1吋的，現在則有人用1.25吋，也有人用1.4吋。這些以目標魚種來命名的漁具，大致是以其習性來設計網目大小與層數，不過在實際使用上，不會只有抓到那種魚，該網目大小以下的魚都會抓到，且使用的網目大小也會依據需求彈性調整。這除了呈現在漁民所用的「沙腸綾」網目大小不一之外，還顯示在即使現在漁民從海上帶回的漁獲中仍然會有花枝，但主要網目2.8吋的三層網「花枝綾」

33 在本文中，我視「竹午」為較大的午魚，但事實上，也有些漁民認為「竹午」是另外一種魚，其中的生物種辨識與分類問題，還有待後續研究者深入探討。

34 此段是整理自一些零散的田野紀錄。這些對於魚種習性的理解當然一部分就像魚汛季節，來自可以系統化表述的知識，但如前所述，漁民據以安排海上勞動的，主要仍是自己在實作中累積的經驗。

(hue-ki-ling) 現在已很少用了，因為它的網目介於「烏綾仔」(3.3吋) 跟「三牙綾」(2.5吋) 之間不上不下，再加上花枝往往是自己纏上去，而不是被網到的，因此實際上什麼網都會抓到。又例如，雖然有網目3.2吋的「紅邊綾」(âng-pinn-lîng)，但現在靠海村大部分的漁民都是用網目比較小且同樣是單層網的「三牙綾」抓紅邊。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以前捕到的紅邊體型平均來說比較大，「紅邊綾」的網目大小是依當時紅邊的平均大小而設計的，但現在因為捕撈的量越來越多，體型大的紅邊越來越少，所以很少人使用對應於以往的紅邊平均大小的「紅邊綾」了，而是用「三牙綾」捕捉較小隻的紅邊。

目標魚種的設定，則涉及漁民對於漁獲的價值、其對應的漁法，以及個人的個性和體力考量等。漁民阿泰較勇於挑戰且具創業家性格，經常以漁場相對遠且漁獲量較不穩定的白鯧為主要的目標魚種，這也使他成為靠海村最擅長「浮綾仔」的漁民之一；而明輝哥雖然有不少的「沙腸綾」，但他認為自己年紀不小了，即使現在有起網機，要拖動網目細的「沙腸綾」仍然相當費力，且沙腸仔的單位公斤單價並不高，這代表要以沙腸仔來換取收入需要捕撈相對大量而沉重的漁獲，於是選擇以身體為優先，等到接續來到的紅邊「大出」時節才經常「去海」。這些複雜的考量促成了漁民各有不同的靠海生活，甚至帶來對於海洋的不同認識。

與吳映青(2019)的觀察類似，有不同的目標魚種，施作不同作業方式的漁民，對於在什麼時機適合下網，往往有不同的認知。起初我在拜訪另一位漁民阿維時，就對他說自己小潮時比較有空接受訪談印象深刻，後來才知道對於主要放「浮綾仔」的他來說，大潮時正是適合「去海」的時機，因為潮汐漲退速度快，隨潮汐漂流的網具移動速度也就比較快，容易捕到較多漁獲。然而，適逢大潮卻常常是放「沉綾仔」的漁民不「去海」的原因，因為水流急也就容易帶起海底的廢棄物。海洋廢棄物不只會干擾漁網的功能，清理更是費時，漁民們一漕(tsó)³⁵網都至少有約六百至八百公尺長，清理網子時需要將網子展

35 「漕」在靠海村漁民的用法中，指的是在海上放網時所操作的網具組數，每一組網具都由數片漁網編織組合而成，但組合的方式依個人的放網習慣有所不同，有些人傾向放比較多「漕」長度不那麼長的漁網組，有些人習慣放很長的一「漕」漁網組。

開、將其中的木屑、鐵絲或塑膠等物仔細清除，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若網到很多廢棄物又缺乏勞力的話，有時更得費上好幾天清理。對比而言，如果網子乾淨的話，漁民就可以在起網時順便清理，甚至同一趟航程就可以直接再次下網，省下一次海陸往返的油錢與時間，又有機會捕得更多漁獲。通常放「沉綾仔」的明輝哥，如果捕紅邊的季節遇到大潮的日子但仍想要「去海」，就會改放「現流仔」，即使抓不到作為主要目標魚種的紅邊，至少還能網到一些其他漁獲，且不會把漁網弄得太髒。長期下來，雖然其他漁民不一定同意，但明輝哥堅持大潮時與其利用強力的水流在漲退潮期間放網，不如在滿潮時以「現流仔」的方式捕撈能抓到比較多的魚——這是他的經驗。

總結來說，無論是在捕魚活動當下的直接感知上，或者在累積藉以理解海洋的經驗的過程裡，都能見到漁具漁法的運用與海洋之於靠海生活的能供性的浮現具有密切關聯，並且也是同一片海洋對不同人有不同能供性的原因之一。同樣的潮汐狀態，對於習慣放「沉綾仔」和「浮綾仔」的漁民而言就有很不一樣的意義，並且可能在反覆的勞動實踐中，累積對海洋的歧異感知。而依據所感知到的海洋，漁民又會回頭調整自己所使用的漁具漁法，可能是隨著潮汐的週期替換放網方式，或者依據漁獲大小的變化調整使用的網具網目。漁民對於海洋的認識，以及在這樣的認識下而得以帶回的豐碩漁獲，正是在這樣充滿動態、偶然但具體的，運用各種漁具漁法「去海」的過程中持續浮現。

至此，我所說明的是漁獲這項海洋之於靠海生活來說重要的能供性的浮現過程如何涉及漁具漁法的運用與調整，然而明輝哥所謂「經驗有沒有到」，意義不只在是否能帶回豐碩漁獲，還在於能否理解水流與天氣變化進而安全回港。換言之，漁民「去海」也需要「看」天氣與海象，由此而言，海洋對於靠海生活來說就不只是具有豐碩漁獲的地方，還是需要時時留意風浪的地方。此外，如同人們對於在何時何地地下網、起網能捕得較多的漁獲不一定有共識，每個人對於當天的海況是否有能安全「去海」的能供性，也會有不同的評價，而這將帶出的是，海洋之於靠海生活的能供性不只涉及前述的漁具漁法，還關乎漁民所使用的漁船。

六、因船而異的「好天」與「壞天」

或許是因為昨天漁獲豐收，這天明輝哥家的聚會瀰漫一股歡快氣氛，餐桌上除了幾樣青菜之外，還有一盤煎魚，包含較小尾的三牙、紅邊與黑格，其中黑格還是柳哥昨天放「現流仔」抓到的，說起這件事，他顯然有些得意。當他們聊得正開心，突然騎著機車來到的阿雲卻打破了對話，並且見到還在吃飯的明輝哥第一句話，就是語帶驚訝地問明輝哥今天怎麼沒去放網？明輝哥秀出自己拇指上的OK繃，說是昨天受了傷所以才沒出海。他們在對話間沒有提到天氣，但是阿雲的問句背後的意思是：今天天氣這麼好，明輝哥怎麼會沒有趁著今天出海？當天氣的話題真的被提起，是在大家飯吃得差不多了之後，柳哥說要留一些菜帶便當，因為明天是「壞天」（pháinn thinn）。這時阿雲大聲地說：明天怎麼會是「壞天」？明天應該是「好天」（hó thinn）。大家接著開始討論起明天到底是「好天」還是「壞天」，以及「好天」（或「壞天」）會持續幾天。

有關明天是「好天」還是「壞天」，柳哥、阿雲和明輝哥有不同看法。明輝哥和阿雲先說會是「好天」，柳哥則說是「壞天」，因為他昨天去放網的時候風就已經吹起來了，還說今天十二點也有起風，但兩點時就沒有風了，似乎隨時都在注意有沒有風。聽見這樣的講法，阿雲拿出手機，點開海象預報網站windguru中外海的海象預報給柳哥看，要證明明天會是適合出海的「好天」。不料柳哥一看，反而大聲地說道「這算好天喔！？」，並開始針對網站上明天的浪高數值1.1與今天的浪高數值0.9做比較，³⁶質疑這樣的浪阿雲今天怎麼可能在船上站得穩？明輝哥看了也改變想法，認為阿雲會說是「好天」是因為他開的是「雙層」（siang-tsân），如果像他開「籤仔」，這樣的海象是不可能出海的，他前兩天出海都不敢去離岸較遠、風浪比較大的地方放網，而是去離岸較近的漁場，回來的時候也已經感受到很強勁的風浪了。不過對於這樣的說法，這幾天同樣曾開船經過他們所討論的漁場附近的阿雲，仍堅持今天沒有什麼浪。³⁷

36 此處浪高的單位是公尺，但是漁民大部分只說數字。

37 上述田野故事改寫自田野筆記2023/03/09，括號內的標楷體引述皆為當下速記。

我對這樣的場景並不陌生。在靠海村，天氣是日常生活裡一項常見的對話主題，每當我在戶外空間和漁民間聊，遇到對話的空檔時，最常聽到對方突然說起的話題就是現在有沒有風、風的來向，以及未來幾天會是「好天」或者「壞天」。起初我以為「好天」與「壞天」和長年住在都市的我所理解的好天氣與壞天氣相仿，後來逐漸發現漁民們說的「好天」與「壞天」，比較強調風的大小，而非氣溫、濕度或雨量。這是因為，風的大小與來向會影響海浪的狀況，進而影響他們的海上作業，包含起網時需要投入多少力氣穩定軀幹，以及造成暈船等身體不適的可能性。換言之，「好天」與「壞天」不是能抽離「去海」活動的天氣評價，³⁸而是關乎當時的海況是否具有供漁民安全出海與回港的能供性。正因為天氣涉入了漁民所互動的海洋當下的能供性，所以漁民經常討論、交換對於天氣的見解，而從明輝哥、阿雲和柳哥對於相同浪高數值是「好天」還是「壞天」的歧見來看，一天的海氣象對漁民來說是「好天」還是「壞天」，事實上也與漁民所用的是什麼樣的船有關——使用不同船隻的漁民，對於同樣的海氣象可能有不同的感知經驗，並且對於當天是否能「去海」有很不一樣的評價。

靠海村的漁民所使用的漁船大致可分為兩種：「排仔」（pài-á）和「籤仔」。排仔指的是以塑膠管並排再以繫繩網綁而成的船筏，依據功用而有大小之別，養蚵所使用的「蚵排」（ò-pài-á）大多以單層排筏為底，使用的塑膠管較細，並排管數大約八至十支，上頭再加上木板，整體寬度較窄，方便穿梭於蚵棚之間；捕魚用的排仔則大多是「大排」（tuā-pài），在靠海村多稱之「雙層」，也就是以雙層塑膠管為基底的排筏，且使用的塑膠管通常比較粗，整體寬度也比較寬，是西海岸近海漁民常見的漁船。這種漁船遇到風浪時比較穩，且作業空間較大，使用「浮綫仔」，或者要去比較遠的漁場放網的漁民大多會開「雙層」，因為能載比較多，或比較長而大張的漁網。

「籤仔」則是底部成V字形的玻璃纖維快艇，形狀細長，由於使用重量較輕的玻璃纖維強化塑膠製成，移動速度較「排仔」快，是現在靠海村的漁民在

38 為避免將「好天」與「壞天」的意義化約為字面上的好天氣與壞天氣，本論文提及「好天」與「壞天」時，皆加上括號。

捕魚時主要使用的船隻。這種船差不多在1980至90年代開始較多人使用，開「雙層」的老虞還記得那時不少回鄉從事漁業的年輕人都是開「籤仔」，速度快得他怎麼樣也追不上。臺灣其他地方也有不少漁民使用「籤仔」，但各地的型態各有不同，靠海村的特色在於用來「破浪」（phuà-íng）的V字型底面中央的「籤刀」（tshiam-to）比較尖銳，這是漁民之間交流意見與改良的結果，因為臺灣海峽冬天的浪很大，想要開得夠快，必須切破浪的水流。速度快除了在追逐魚汛時（尤其冬天追逐烏魚時）可以更加迅速，還可以大幅減短出海時間，較年長的漁民回憶以前開「排仔」出海，來回漁場往往要花到一整天，但現在很多人都是用「籤仔」，半小時或一小時就可以到達目的地，如果抓不到魚就早點回來，原本需要待在海上的時間就可以挪作他用。

「籤仔」雖然速度快、機動性強，但是也由於重量較輕、重心較高，人站在「籤仔」上感受海浪晃動的程度較「雙層」大，而這正是開「雙層」的阿雲會覺得那天浪高1.1公尺的海象感覺起來幾乎沒有搖晃，是「好天」，但開「籤仔」的明輝哥卻覺得根本站不穩，是「壞天」的原因。也就是說，船隻形式的差異可能使得身處其上的漁民有很不一樣的勞動體驗，進而對相同的海氣象條件有很歧異的評價。甚至最極端而言，開「雙層」的老虞，認為是「籤仔」才會細分「好天」或「壞天」，開「雙層」的他沒有在分「好天」或「壞天」的，只要不是「做風颱」（tsuè-hong-thai）的天氣都可以出海。從這些例子來看，「好天」與「壞天」顯然不單純是對海上天氣與風浪情況的表述，而較接近當天海洋對漁民來說是否具有能以自己所擁有的船隻安全前往之能供性的評價。

尤其重要的是，這僅僅是出海與否的考量之一。漁民雖然關心一天是「好天」還是「壞天」，但並不是「好天」就一定會出海，「壞天」就一定不會出海。有時連續好幾日「好天」，出海的漁民反而很少，因為海裡的魚已經在大家都能安全出海的日子裡被抓完了，再「去海」也只是徒耗油料；反之「壞天」雖然海況危險，但海浪的捲動比較會把魚逼出來，且若出海的人少，當天的漁獲價格就可能比較高，因此有些人「壞天」也會出海。例如在我進行田野期間的那年冬季，我站在陸地就可以感受到強烈的東北季風，那陣子缺錢花用的阿源雖然也認為那幾天都是「壞天」，仍然每天到風浪相對小的沿岸抓黑格或螃蟹。換言之，是不是「壞天」比較接近是否出海的消極因素：並不是因

為今天是「好天」或「壞天」就出海或不出海，而是相反的，因為海上有具有市場價值的漁獲、漁民想要出海，而有「好天」或「壞天」的評價區別，如果抓不到魚的話，即使是「好天」也不一定有人出海。相似的發現，亦見於Firth（1975[1946]）的馬來漁民民族誌、王崧興（1967）的龜山島民族誌，以及Kalland（1980）的九州漁民民族誌，後者更提及，漁民眼中的天候其實與預設的漁獲量有密切的關聯，近日的漁獲量不佳時，漁民便傾向於將微小的風也視為壞天氣（同上引：106）。

這樣與漁獲預期、漁具漁法和漁船深刻相關的天氣評價，會進一步使漁民展開不同的生活。例如，與阿源相比，明輝哥比較謹慎，通常不會在「壞天」出海，但這也使他出海的日子顯得更加忙碌。有一次我下午去到明輝哥家，蘭姐少見地邀請我進去泡茶，並說今天忙了一整天，早上四點出海去抓三牙，回來還殺魚、處理真空包裝，等等不想煮飯了（原本他們家幾乎每天晚餐都會開伙），而今天特別忙碌，是因為「我們『籤仔』只有今天好天」，³⁹所以要把握時機出海捕魚。由此可見，如同使用不同漁具漁法的漁民可能對同樣的海況有不同的時間安排——對放「浮綾仔」的阿維來說，潮差較大的日子較潮差小的日子忙碌，但對於放「沉綾仔」且沒有人力清理網具的漁民來說，卻是誰都不想「去海」的日子，或者就要換一種漁具漁法——使用不同漁船的漁民對於海氣象是否足夠安全可以「去海」的評價，也使漁民的靠海生活有不一樣的工作與生活安排。

更進一步來說，這也暗指漁民在「看」出海洋的能供性的同時，也在預想自己「去海」的時間安排。我已說明漁具漁法和漁船如何涉入了漁民的感知環境、累積經驗的過程，以及海洋如何在這樣的過程中，成為對漁民來說能安全帶回豐碩漁獲的地方，但上述田野材料不只呈現漁民如何藉由經驗與工具「看」出海洋的能供性，還顯示這樣的過程也是在「看」出適合「去海」的時機。接下來，我將聚焦在漁民的養蚵工作，進一步將這樣的討論推往時間的面向。養蚵活動同樣強調經驗，也要時時留意天氣狀況（養蚵用的「蚵排」並沒

39 田野筆記2023/03/15，括號內為當下的速記。

有捕魚的「雙層」耐風浪），但是其中強調的經驗比較著重對潮汐漲退速度與潮位高度的觀察，進而衡量適合「去海」的時機。

七、倒棚仔、浮棚仔與海洋的「時間性」

蚵仔是臺灣西部沿海，尤其彰化、雲林、嘉義與台南地區重要的養殖水產，但與魚塢養殖不同，蚵仔大多養在海上，且幼苗來源並非人工繁殖，這兩項特質高度形塑了養蚵活動的勞動性質。首先，由於蚵苗來源不是人工養殖，而是在合適的季節與位置，將廢棄蚵殼串成的蚵串掛在海裡「寄栽」（kià-tsai），附著海中的蚵苗而得，因此養蚵工作具有明顯的季節性週期；⁴⁰其次，由於蚵仔是濾食性生物，需要在水中養大，但是漁民並不能潛入水下整理蚵棚，因此養殖蚵仔的方法大多都在尋求能一方面讓蚵仔留在海中，一方面讓身在船上的人能夠整理之的方式，其中一項會被用以達成此項目標的，即是海洋的潮位變化。有關蚵仔養殖，林志德（2008）對於嘉義東石蚵仔養殖產業，從養殖技術到產銷網絡皆有詳實的記述，本節會比較強調蚵仔養殖活動中與時間安排有關的面向。

蚵仔在體外受精後，受精卵會先經過約三週的浮游生長為眼點幼生，此時需要在四十八小時內附著到固定的介面上，而「寄栽」所附得的即是眼點幼生，一般認知合適的採苗季節為農曆三月及八月（張引等 2008），靠海村漁民的說法則是農曆八至九月為主。附得幼苗後，濾食性的蚵仔持續吸收海水中的藻類長大，而漁民會在隔年慢慢依據個體生長狀況對蚵仔「分栽」（pun-tsai），將生長狀況近似的蚵仔綁到同一個蚵棚上，方便安排收成順序。清明左右，漁民就會開始從前年「寄栽」的「老蚵」（lǎu-ô；或稱為「古蚵」[kū-ô]）開始收成，再收成去年「寄栽」的「新蚵」（sin-ô-á），大致收成至中秋之後，開始修整蚵棚、準備「寄栽」用的蚵串，開始新一年的週期。

在這些不同的工作階段之中，漁民「去海」的迫切程度有很大的不同。最忙碌的時期當然是在夏季收成的時候，因為那時雖然蚵仔正「肥」（puì），但

40 事實上，蚵苗是可以人工繁殖的，但因為成本較「寄栽」高，漁民大多仍是以「寄栽」方式取得蚵苗。

若遇到颱風，蚵仔「驚著」（kiann-tioh）就會又「瘦」（sán）了，所以漁民大多會趕在颱風季節之前收成。蚵仔收成回來後需要清洗、去殼等處理作業，因此需要將每天收成的量控制在當天或者隔天處理得完的量內，否則若蚵仔放久了容易腐壞，勞動生產的成果將無法轉化成收入。此時天天都可以在漁港見到漁民從海上將蚵仔收成回來，洗蚵仔、鋟蚵仔，但卻也常常好幾天都見不到熟識的漁民，因為他們往往都清晨就出海，回港後又要忙著洗蚵仔、鋟蚵仔，處理完後也累了，要早點休息為明天出海工作做準備。但如果是冬天，由於那時蚵仔大多還未到達可以收成的肥度，漁民所需要做的只有確保牠們沒有被蚵螺吃掉，以及隨著蚵仔的體型變化，適時調整蚵殼之間的間距，讓每顆蚵仔能獲得充足營養，這些整理工作並沒有迫切的時效性，因此常常可以見到只有養蚵沒有在捕魚的漁民，在村子裡各處喝茶、打牌。這樣的區別充分顯示與蚵仔養殖相關聯的「去海」活動，如何因漁民對於蚵仔秋季容易附苗、夏季比較「肥」的生物習性的認識，而在時間安排上有顯著的差異，並且需要留意到的是，這樣的差異不只因為生物習性本身的限制，因為這些生物習性對於漁民靠海生活的意義，終究是在人們為了收入而「去海」的勞動中浮現——之所以在夏季收成，除了因為那時去年秋季「寄栽」的蚵仔已經成長到一定大小之外，還因為那時蚵仔正「肥」，在以公斤計的交易方式裡能賣得比較好的價格。

如果再更仔細以一天的尺度來看養蚵工作的時間安排，則可以發現其高度關乎對潮汐漲退的感知，並且這樣的關聯同樣發生在靠海生活的脈絡中。「我們揀（khioh）蚵仔不是像平地或山林，固定早上幾點去都可以。」⁴¹嫁到靠海村之後就開始養蚵，至今已超過三十年的妙姐解釋說，她養在「倒棚仔」（tó-pènn-á）的蚵仔要等水位退到一定程度，才能去收成。「倒棚仔」是靠海村漁民常用的養蚵方式，指的是在近岸水深約一公尺左右的淺灘地上，衡量適當的高度以竹竿架設數排棚架，將蚵串兩端分別掛在兩排棚架上，形成一整排橫掛的蚵串，並讓這些蚵串大多數時間沉在水裡，但退潮時離水，如此一來，蚵仔一方面可以在潮位較高時濾食藻類，而漁民則可以在退潮時去整理蚵棚或收成

41 田野筆記2023/03/12，括號內的標楷體引述為當下的速記。

蚵仔。這樣的工作需要配合潮汐，所以沒有辦法每天固定同樣的工作時間，妙姐舉例，像那天7點乾潮，那她今天7點去做工作剛剛好，但明天如果仍然7點出海，可能就要找比較高、浮出水面較多的棚架才有工作可以做。在「倒棚仔」的運用下，潮汐漲退成為海洋對於蚵仔養殖來說重要的能供性，在滿潮時帶來蚵仔生長所需要的營養，在退潮時則供漁民整理浮出水面的蚵仔，而觀察潮位的變化，安排適當的出海工作時機，即成為蚵仔養殖所要求的「經驗」。

對於潮汐漲退的狀況，中央氣象局的網站都有各海岸段的潮汐預報，漁民也多少都會留意，但是要適當安排工作時間，只仰賴氣象局的預報並不足夠。首先，預報終究只是預報，與現實之間可能存在差異，因此多數漁民還是會在出海前，到漁港看實際的水位與潮汐漲退速度，這時他們會善用漁港結構的斷面、堤防石材之間的縫隙，以及漁港旁供漁民上下船的階梯等作為標定水位的記號，以這些記號隱沒入水中的程度、或者與水面的距離，理解當下的潮位狀態。其次，漁民的蚵棚所在的位置與港口有段距離，因此不只滿潮的時間與港口不同，還要加上從漁港移動到那邊的時間，以妙姐的狀況來說，從靠海村旁的漁港出發到她養在北邊的「倒棚仔」大約要十分鐘，但如果要去南邊的「倒棚仔」則比較遠，「蚵排」要開大約四十分鐘，因此如果要去整理南邊的「倒棚仔」，就會需要更早出海，才能充分利用低潮位的時間。最後，雖然潮汐每天推遲五十分鐘，但大小潮還是有別，以妙姐的經驗來說，如果今天是小潮，那隔天大概晚五十分鐘去工作，如果是大潮則因為退潮速度比較快，大概只需要晚三十分鐘去。由於這些都仰賴對於潮汐漲退的仔細觀察，我曾不只一次見到較為年輕的漁民載著自己的父母輩來到港口，正打算要出海時，被父母輩埋怨太晚來了，而要會算這些時間，就要「有經驗」，也就是除了氣象局預報的漲退潮時間與潮位之外，還需要有技巧地觀察潮汐漲退，藉以適當安排「去海」的時機。

不過這樣對於經驗的強調，仍涉及養蚵方式的差異。妙姐都是用「倒棚仔」養蚵，但養蚵的方式並不是只有「倒棚仔」一種，而是一直在演進。明輝哥的爸爸還在世時，就是以養蚵為主，明輝哥回憶他小時候，養蚵是用一根根約三尺長的竹子，其中一邊削出一個口，把蚵殼插在上面，一根竹子一個蚵殼做成「蚵籬仔枝」（ô-lê-á-ki），就這樣插在沙地上附苗、養殖，退潮露出水面

時，就可以去整理或收成。後來開始有把蚵殼串起來後兩端綁在竹製棚架上的「倒棚仔」，這種養殖方式由於不用一根一根竹子插，效率比「蚵籬仔枝」好，但也要趁退潮時蚵仔露出水面才能去整理。再後來，也就是現在，除了倒棚仔之外，還有搭製竹製棋盤狀棚架，並加上浮具使其可以浮在水面上、底下連結重物以固定位置的「浮棚仔」。⁴²在這種養殖方式中，蚵仔是垂吊於浮在水面上的棚架下，二十四小時都在水面下吸取養分，漁民要整理浮棚仔的蚵仔時，則大多直接踩在浮棚仔上，將整串蚵串拉離水面整理，之後再重新放回水中，這樣的過程比較費力，但是就不必考慮潮汐漲退的時間。因此，明輝哥說，現在用「浮棚仔」和以前用「倒棚仔」不一樣，養蚵工作「沒有時間性」⁴³了。

也就是說，雖然蚵仔有需要濾食海水中的藻類長大的生物習性，但是讓漁民需要擬定時間安排的，是配合潮汐漲退的養蚵方式。對於養「倒棚仔」的漁民來說，要趁潮位低的時候「去海」整理蚵棚或者收成，但是如果用「浮棚仔」養蚵就「沒有時間性」，不用考量潮汐的漲退。上述對比明顯呈現，如同使用不同漁具漁法、漁船有不同的忙碌時期，使用「倒棚仔」與「浮棚仔」養蚵也有很不一樣的時間安排，而這源自於潮汐漲退是否涉入養蚵活動中海洋的能供性。此外，或許更有意思的是明輝哥「沒有時間性」⁴⁴的說法。「時間性」一詞在明輝哥的用法裡，意思較接近「固定時程」、「時機安排」，但同時換了養蚵方法就「沒有時間性」的說法，又提醒了這樣帶有固定性的「時間性」並非鐵板一塊，而是會因為人所使用的工具而改變。這樣的「時間性」，顯然並不是簡單依循潮汐漲退或水產生物生長的物質流變，我認為比較合適的理解方式，是漁民以各種工具在「去海」的活動中賦予海洋的各項物質流變意義而得的時間。

42 林志德（2008）的研究還有記錄到「站棚仔」（khia-pènn-á）的養殖方式，但此時報導人未提及，因此未寫入。此外，此處僅列出養殖作業方式的差異，蚵仔養殖產業經歷的工具變化，還有串蚵用的線材等，更詳細的演進亦可見林志德的整理。

43 田野筆記2022/12/20，括號內的標楷體引述為當下的速記。

44 當下我曾與明輝哥再三確認用詞。此外，明輝哥對於「時間性」一詞的用法並非特例，田野過程中，也曾有漁民問我來這裡做研究的「時間性」是什麼？這樣的問句裡，「時間性」所指涉的也接近「固定時程」、「時機安排」。

在當前關於海洋的討論，尤其潮濕本體論（Steinberg and Peters 2015）以降的分析中，海上交織的物質韻律經常是理解靠海生活的重要切入點。呂欣怡（2022）在描寫近沿海漁民利用時間創造價值的技藝時，就相當著重於會隨時變化的潮汐漲退、漁獲季節、天氣變化，以強調「海洋環境具有不同於陸地的時間節奏，身處其中的漁民長久以來與海互動所發展出的特殊勞動方式與生命經驗必須被肯認」（同上引：127）。不過，Munn（1992）、Ringel（2016）皆提醒人類學對於時間的研究，不應停留在關注各種自然韻律或社會再現，而是要留意人如何具意圖與預想，創造性地構作對於人們有意義、活在其中的時間，也就是人們「時間化」的實作。這樣的實作，如Bear（2016）已指出的，是涉及與物質世界的交涉、身體的限制、多種工具，以及和各種韻律與時間再現協作的創造性中介行動。因此，本文想要以能供性勞作的取徑深化這樣從時間面向上的特殊性理解海洋與靠海生活的觀點，指出漁民不只是以各種方式回應海上的物質韻律，更是積極將其轉化為對於生活有實際意義的「時間性」。Horisberger（2021: 126-149）已透過在巴西的河口三角洲的觀察指出，對於當地捕蝦的漁民來說，預測每次潮汐是不是會帶來蝦群的「好的潮汐」相當重要，當地人對於每個將來到的潮汐顯然有所預想（anticipate），並且會說任何事情都有其時間（“everything has its time”；*tudo tem seu tempo*），但是這所謂的「時間」，並不應該理解為外在於人的流變，而應理解為人與非人的親近互動下所形成的「時間」，需要人對潮汐與生物習性等多於人的韻律的注意力並且在實作中調整。與此相似，前述養蚵工作的「時間性」，甚至前幾節所論及的潮汐與魚種習性，都應理解為人們出於特定的目的、運用工具在與物質世界的互動中「時間化」（Munn 1992）的「時間」。

在前幾節，我已多次提及潮汐如何在靠海生活中具有影響力，並且強調其雖然具有依據日月引力每天延後約五十分鐘的漲退週期與以十四天為一個週期的潮差變化，但是漲潮、滿潮、退潮、乾潮、大潮、小潮在靠海生活中，都是依據漁民要「去海」進行什麼樣的勞動而產生意義。對於捕魚活動來說，有的漁民選擇在滿潮時放「現流仔」，有的漁民則是在自己認為比較容易捕到魚的漲潮或退潮期間下網，而每十四天一次的大潮，對放「浮綾仔」的漁民來說正是忙碌的時候，但對放「沉綾仔」的漁民卻是不會「去海」的日子。對於養蚵

工作來說，若是使用「倒棚仔」，需要依據經驗配合潮汐漲退衡量合適的出海時機，以在潮位較低的幾個小時內完成整理蚵棚的工作，若是使用「浮棚仔」則較不受潮汐影響，只要當下能夠出海、到達蚵棚區，就能整理蚵仔。這些例子都顯示，潮汐變化確實是漁民相當關注的物質流變，但這樣的關注是在利用海洋之於靠海生活的能供性的脈絡中產生意義，並且對於漁民的生活安排確實具有意義的「時間性」，也並不是潮汐漲退的物質流變本身，而是在漁民以漁具漁法和各種養蚵方式與潮汐的互動中時間化。

另一個本文多次提及的，是各種水產生物的習性。在捕魚活動方面，依據對目標魚種的生物習性出於經驗的認識，漁民對於適合去放網的時機有所預想，並且牽引了靠海生活的時間安排。例如，白鯧要在水色較混濁的時候比較容易抓到，但三牙則較常在水色清澈的時候捕到，對以這兩種魚種為目標的漁民來說，適合出海捕魚的日子就有很大的差異。此外，如果要捕捉被認為晚上才會出來活動的紅邊，漁網就需要放隔夜，因此出海與回港的時間與一般在白天放網時相反。然而，這些影響同樣要在靠海生活的漁民與海洋的互動脈絡中理解：因為漁民想要捕抓白鯧、三牙與紅邊，所以會依據對這些魚種的生物習性的認識，衡量什麼時機適合「去海」。反過來說，海洋中的水產生物必然不只上述幾種，但卻不是每一種生物的習性都在漁民的靠海生活中有顯著的意義，例如，臺灣海峽的土魷魚冬季最肥美，但是棲息的水域離靠海村較遠、水深較深且冬季風浪強烈，船隻從靠海村出發開到該處的風險太大，靠海村漁民冬季捕撈的魚種主要還是烏魚與午魚，若說起土魷，則會說那主要是比較靠近臺灣海峽的澎湖漁民在抓的。也就是說，會牽引工作安排的，並非海中的所有生物，而是漁民在特定的漁船與漁具漁法的運用下，作為海洋之於靠海生活所具有的能供性的特定幾種水產生物，並且這幾種生物的習性，亦是在漁具漁法和漁船的運用下對於靠海生活而言具有「時間性」。

在蚵仔的生物習性方面尤其有意思。如前所述，蚵仔養殖有依循季節安排的工作週期，其中會去「寄栽」的時間點大致是中秋後到過年前，但依據林玫鈺、張引（2013）的跨域全年觀測，蚵仔的眼點幼生在海中出現最大量的時期並不一定在此時，甚至在2012年雲嘉沿岸的觀測資料中，眼點幼生出現最多的月份反而是一般在進行收成工作的六月。不過，即使科學觀測的結果如此，漁

民仍然如前述季節安排養蚵工作，並且這是對他們來說再真實不過、確實可以依循之安排工作的時間。這顯示，蚵仔養殖隨季節展開的工作安排，並非單純依循蚵仔的生物習性本身，而較可能來自漁民與海洋互動的經驗造就的，海洋對於蚵仔養殖工作來說確實有用的能供性。

總結來說，海洋有許多交織的物質韻律（或較常見到的說法：海洋具有時間性），這也是理解靠海生活的重要切入點，但如同前幾節對於漁民如何活用與改造各項海洋要素以開展生活的分析，靠海生活的各種「時間性」應從漁民「去海」的實作脈絡來理解。「時間性」萌生自對於環境的細膩觀察、以觀察者為參照的能供性勞作，海上確實交織的各種物質韻律，但這些韻律都是透過漁民活用各種工具的創造性中介成為人們活在其中的時間。

八、結論：再思「海洋文化」

本文以能供性的理論為框架理解靠海生活以及海洋環境之於漁民的樣貌，並聚焦在人們活用工具與環境的實踐。這樣的嘗試不從人們對於海洋的常見預設出發，也不拘泥於傳統文化的紀錄，而是從人們「去海」的具體互動脈絡開始，關注漁民如何在日常實作中來展開自身的生活與世界。本文雖然以靠海為生的人群為田野對象，但無意證成某種與陸域生活具有無法化約的差異的海洋生活方式，而是在考慮人與海洋具體互動脈絡的前提下，透過能供性勞作的理論將常民的世界構作具體化，來理解靠海人群在當代藉以支持生活的海洋與「海洋文化」。

海洋在較早期的功能論式人類學作品中被理解為充滿不確定性的地方（如 Acheson 1981；McGoodwin 1990；王崧興 1967），晚近潮濕本體論（Steinberg and Peters 2015）關於陸地中心觀點的批判亦是從作者認為海洋相對於陸地快速的流動性與複雜的時間韻律展開，但本文要提醒的是，靠海生活的漁民對於海洋的理解並未停留在此處，反而是積極地累積經驗以將海洋轉化為富有生產力、能支持生計的所在，並活用各種工具將海洋與水產生物的物質韻律轉化為能被利用與納入生活安排的「時間性」。為此，本文嘗試透過能供性勞作來理解海洋之於漁民的意義浮現的過程，將漁民對於海洋環境的感知，強調其中對

於漁具漁法、漁船以及各種養蚵方式的工具運用脈絡化，以此呈現雲林濱海的靠海世界與生活如何在日常實踐中展開。對於不同習性的漁獲需要使用不同的漁具漁法，海況對於漁民來說是否足夠安全也因漁船型態而異，在蚵仔養殖方面，使用不同的養蚵方式，也使潮汐的漲退具有不同的意義。漁民在與環境的具體互動中累積藉以觀察海洋的「經驗」，運用漁具漁法、漁船和各種養蚵方式「看」出海洋環境的能供性，進而安排適合「去海」的時機。在這樣的過程中，漁民並非簡單「受制」於魚種習性、潮汐漲退、海況變化以及這些海洋相關的變化蘊含的物質韻律，反而可以見到的是漁民積極地在實踐中改造環境要素、構作海洋的意義與能供性，從而展開自身的靠海生活。

透過這樣的民族誌書寫，本文一方面呼應Dua (2024) 在晚近的回顧文章中整合海洋人類學近年的研究成果，認為「海洋並非空無一物，但也不是單純人類的或單純陌異 (alien) 的空間 (同上引：175)」的看法，嘗試呈現海洋的多義性；另一方面聚焦在以往研究中的傳統生態知識背後蘊含的創造性實踐，進而刻劃更貼近人們的日常生活實踐本身的「海洋文化」。近年來，關於臺灣的「海洋文化」有越來越多的討論 (見邱文彥等 2020)。這樣的討論有其政治上的意涵，即透過海洋與島嶼特質凸顯臺灣主體性 (見戴寶村 2011)，但從比較的角度來說，這樣的討論傾向，與日本在十八、十九世紀面臨西方現代性的刺激而欲以「海國」確立自身區域政治地位的論述而運用海洋的方式有類似之處。藍弘岳 (2012) 指出，日本的「海國」論述浮現於與西方勢力的交會，用以差異化「陸國」中國或甚至整個被歐洲文明史觀所定義的「亞洲」，進而宣稱自身與西方政權達到相似的文明發展階段。本文想要提醒的是，這類論述往往透過對於海洋近乎本質化的想像來對比陸域生活，以作為思想上的啟發與建立政治上的宣稱，論及人群與海洋的親近關係時，則往往是從與海洋相關的歷史與傳統文化展開，在生活中實際與海洋打交道的人群的生活方式，經常未被細緻探討。

另一個當今人群與海洋的互動方式未被細緻探討的原因，或許是因為涉及太多現代技術的運用與關於收入的經濟計算，從而與一般想像的「文化」有落差。如本文在田野地的脈絡中所呈現的，這樣的靠海生活方式與人們的都會流動經驗密切相關，而隨著漁業相關技術的演進而改變的漁業勞動型態和利潤

多寡，也是許多靠海村漁民現在從事漁業的重要考量。在漁民的日常生活中，可以明顯見到考量多方成本與效益的精細計算（例如用什麼樣的網子最適合捕撈特定漁種、什麼樣天氣出海才不會徒耗油錢），並且正是在經濟考量下萌生本文論及的各種海上勞動實作，以賺取不遜於都市工作的收入，但又比都市生活有更多彈性安排生活時間的自由。這不是一種與消費和資本主義對立的傳統文化，而較接近人們回應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城鄉經濟和生產技術變化的一種「生活下去」的創造性實踐，本文認為應肯認這些創造性實踐的重要性，並且以此為理解當代的人與海洋關係，進而建構「海洋文化」論述的重要切入點。⁴⁵

參考書目

王崧興

- 1967 龜山島－漢人漁村社會之研究 [Kwei-Shan Tao: A Study of a Chinese Fishing Community in Formosa]。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王驥懋

- 2022 地球政治與海洋研究：論辯與未來研究展望 [Geo-politics and Marine Studies: Debates and Research Issues]。地理學報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101: 85-108。

王驥懋、錢克瑄

- 2022 「水下世」的動物治理：水下空間、海水物質性及動物「感受」 [Animal governance in the underwater-cene: subaquatic space, seawater materiality, and animal affects]。刊於[In]科技社會人 4：跟著關鍵物去旅行 [Technology, society and human 4: following critical objects]，林文源、郭文華、王秀雲、楊谷洋編，頁358-379 [pp.358-379]。新竹：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Hsinchu: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Press]。

45 本文關注人們日常生活中創造性面向的文化觀點，間接啟發自Wagner（1981[1975]）。Wagner指出，他者被稱為「文化」的生活方式卻經常被以系統化、僵固化的「傳統」（convention）來理解，因而抹去了他者的創造性面向，並以Daribi人強調創新和意義的再發明的「文化」為實例說明，創造性的面向也應納入對他者生活方式的理解。雖然Wagner的分析著重於象徵符號而非物質現實的活用，但他強調創造性的文化概念，對於本文所欲描繪的「海洋文化」相當具有啟發性：靠海生活的日常實作並不一定是為了守護或延續某種傳統觀念，更鮮明展現的反而是人們意圖回應生存現況的創造性，本文關注這樣的創造性，以嘗試拓展對「海洋文化」的理解。

吳映青

- 2019 海路：從人類學視角看臺灣近海漁業 ['Hái-lōo': The Interface between Fishermen and Marine Nature]。中國飲食文化 [Journal of Chinese Dietary Culture] 15(2): 7-53。

呂欣怡

- 2022 從時間面向重思離岸風電與沿岸漁業的衝突 [Rethink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Offshore Wind Farm and Nearshore Fishery from a Temporal Perspective]。考古人類學刊 [Journal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97: 123-168。

林志德

- 2008 嘉義縣沿海牡蠣養殖與社會的變遷 [The Oyster Farming and Social Change in Coastal Area of Chia-yi]。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碩士論文 [Master's thesis.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Studies,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林玫鈺、張引

- 2013 牡蠣養殖生產區及最適採苗季節之研究 [A study on oyster farming areas and the optimal season for spat collection]。刊於[In]第35屆海洋工程研討會論文集 [Proceedings of the 35th Conference on Ocean Engineering]，頁447-451 [pp. 447-451]。

邱文彥、胡興華、王毓正、林世昌、傅瓊慧

- 2020 海洋文化與政策議題之初探 [A Preliminary Study on Marine Culture and Policy Issues]。海洋探索 [Marine Research] 試刊號 [trial issue]: 47-58。

浦忠勇

- 2021 原蘊山海間：臺灣原住民族狩獵暨漁撈文化研究 [Between mountains and seas: a study on the hunting and fishing cultures of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新北：原住民族委員會 [New Taipei: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s]。

張引、許弘莒、黃翔瑜、劉景毅、戴仁祥、葉信利

- 2008 雲林海域牡蠣幼生時空分佈研究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oyster spat in coastal yunlin]。刊於[In]第30屆海洋工程研討會論文集 [Proceedings of the 30th Conference on Ocean Engineering]，頁571-575 [pp. 571-575]。

莊英章

- 1981 漁業政策與地區性漁業發展：興達鄉的田野調查分析 [Fisheries Policy and Local Fish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An Analysis of the Case of Hsing Ta Hsiang]。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51: 89-127。

詹森 主編

- 2018 臺灣區域海洋學（二版）[Regional Oceanography of Taiwan (2nd Edition)]。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 廖昱凱、簡旭伸
- 2019 地理學中的量體轉向：領土立體化、地球物理政治與環境中的情感氛圍 [Volumetric Turn in Human Geography: Three-Dimensional Territory, Geophysical Politics and Affective Atmosphere]。地理學報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92: 1-29。
- 劉如意、呂欣怡
- 2019 雲林縣口湖鄉養殖烏魚子的品質建構歷程 [Construction of Quality in the Mullet Aquaculture Industry]。中國飲食文化 [Journal of Chinese Dietary Culture] 15(2): 115-156。
- 蔡政良
- 2022 第五道浪之後：當代都蘭部落阿美族水下獵人的傳統海洋知識 [Beyond the Fifth Wave: Traditional Marine Knowledge among Amis Spearfishing Men of 'Atolan, Taiwan]。臺灣人類學刊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20(2): 139-184。
- 2023 第五道浪之後：阿美族水下獵人的海洋知識與傳統海域的保育與管理 [Beyond the fifth wave: traditional marine knowledge and conservation of traditional sea area among amis spearfishing men]。臺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Taitung: National Museum of Prehistory]。
- 鄭肇祺
- 2021 魚蝦豐收：臺灣養殖產業的漁具、生死網目與技藝體現 [Good Seafood Harvest: Fishing Gear, Life-death Mesh, and Embodied Skills in Taiwanese Aquaculture]。臺灣人類學刊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19(2): 107-145。
- 鄭螢憶、李侑儒 主編
- 2024 漁海共生：東北角到北海岸的漁村地名與日常 [Symbiosis with the sea: place names and everyday life in fishing villages between the northeast and the north coast]。高雄：國家海洋研究院 [Kaohsiung: National Academy of Marine Research]。
- 戴寶村
- 2011 台灣的海洋歷史文化 [Oceanic Cultures & History of Taiwan]。臺北：玉山社 [Taipei: Interminids Publishing]。
- 藍弘岳
- 2012 面向海洋，成為西洋：「海國」想像與日本的亞洲論述 [Facing the Sea, Becoming the West: The Imagination of Maritime Nation and the Discourse of Asia in Japan]。文化研究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4: 273-315。

- Acheson, James M.
1981 Anthropology of Fishing.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0: 275-316.
- Bear, Laura
2016 Time as Techniqu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5: 487-502.
- Berkes, Fikret
2018 *Sacred Ecology* (4th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 Dua, Jatin
2024 Anthropology of and from the Ocea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53: 165-181.
- Firth, Raymond
1975 [1946] *Malay Fishermen: Their Peasant Economy*.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Inc.
- Gibson, James J.
1979 *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Heidegger, Martin
1962 [1927] *Being and Time (Sein und Zeit)*. John Macquarrie and E. Robinson, trans. New York: Harper & Row.
- Helmreich, Stefan
2011 Nature/Culture/Seawater.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13(1): 132-144.
- Horisberger, Nora
2021 "This Tide Will Be a Good Tide": On Movement, Anticipative Waiting and Tricking on the Islands of the Parnaíba Delta, Brazil. In *Delta Life: Exploring Dynamic Environments Where Rivers Meet the Sea*. Franz Krause and Mark Harris, eds. Pp. 127-149.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 Hung, Po-Yi, and Yu-Hsiu Lien
2022 Maritime Borders: A Reconsideration of State Power and Territorialities over the Ocea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46(3): 870-889.
- Ingold, Tim
2000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Essays on Livelihood, Dwelling and Skill*. London: Routledge.
2006 Rethinking the Animate, Re-Animating Thought. *Ethnos* 71(1): 9-20.
2008 Bindings against Boundaries: Entanglements of Life in an Open World.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40(8): 1796-1810. <https://doi.org/10.1068/a40156>
- Kalland, Arne
1980 *Shingū: A Study of a Japanese Fishing Community*. London: Routledge.
- Marx, Karl
1990 [1976] *Capital Volume I (Das Kapital, Volume I)*. Ben Fowkes, trans. London: Penguin Books.

Mattingly, Cheryl

- 2010 *The Paradox of Hope: Journeys Through a Clinical Borderla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cCall Howard, Penny

- 2017 *Environment, Labour and Capitalism at Sea: "Working the Ground" in Scotland*.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2018 *The Anthropology of Human-Environment Relations: Materialism with and without Marxism*. *Focaal: Journal of Global and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82: 64-79.

McGoodwin, James R.

- 1990 *Crisis in the World's Fisheries: People, Problems, and Politic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Munn, Nancy D.

- 1992 *The Cultural Anthropology of Time: A Critical Essa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1: 93-123.

Peters, Kimberley, and Philip Steinberg

- 2019 *The Ocean in Excess: Towards a More-Than-Wet Ontology*. *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 9(3): 293-307.

Ringel, Felix

- 2016 *Beyond Temporality: Notes on the Anthropology of Time from a Shrinking Fieldsite*. *Anthropological Theory* 16(4): 390-412.

Schnegg, Michael

- 2021 *Ontologies of Climate Change: Reconciling Indigenous and Scientific Explanations for the Lack of Rain in Namibia*. *American Ethnologist* 48(3): 260-273.

Steinberg, Philip, and Kimberley Peters

- 2015 *Wet Ontologies, Fluid Spaces: Giving Depth to Volume through Oceanic Thinking*.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33(2): 247-264.

Wagner, Roy

- 1981 [1975] *The Invention of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饒祐睿

106319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r10125002@ntu.edu.tw

Reconceptualizing the Ocean and Marine Culture Through the Theory of Affordance

You-ruei Rau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nspired by the theory of affordance, this article seeks to focus on fishermen's creative engagement with their lives and the marine world in order to develop a novel understanding of marine culture. Recently, there has been a growing body of research on the lifestyles of fishing communities, focusing on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cean as opposed to the land, and traditional maritime knowledge, in order to deal with issues such a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ultural politic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culture discourses. However, some such studies tend to assume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cean in order to imagine how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in an oceanic context can be critically different from land-oriented assumptions, which in turn essentializes the researcher's own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sea. Others often put too much effort into the enumeration of traditional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overlooking the processes through which people creatively produce knowledge and construct lived experiences through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the sea. Taking a coastal fishing village in Yunlin as its field site, this article adopts the concept of affordance as its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explore how oceanic elements including tides, marine weather,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aquatic species are experienced and even transformed through the creative use of tools in fishermen's daily practices. Located right beside the sea, Kao-Hai village has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residents working as fishermen or seafood traders. For people here, the ocean is obviously not only a dangerous site, but also what sustains their lives. It is through the fishermen's labor that the ocean is transformed into the foundation of their livelihood, and the process involves various tools. This article illustrates that the fishermen's

catch depends on the fishing gear and methods they use, and through practicing different fishing methods, fishermen have distinct perceptions of the ocean. Furthermore, whether the weather is suitable for fishermen to go to sea is not an objective issue, but deeply influenced by what kind of vessel the fishermen use. The temporality of the ocean, which is often seen as one of the most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lso depends on how the fishermen use their tools. As a result, although the marine environment has its material essence, it is also constructed through fishermen's daily labor and the tools they use in their labor process. It is precisely through these maritime labor processes that the ocean becomes a place capable of sustaining contemporary fishery livelihoods. Attentive to how the ocean and people's lives are mutually constituted through practice instead of solely focusing on how the marine environment has shaped people's specific lifestyles, this ethnography has two goals. The first is to understand the ocean within the context of fishermen's everyday lives through emphasizing the creative interactions between fishermen and the ocean, and the second is to depict marine culture with a more concentrated focus on the creativity of human beings through the lens of fishermen's daily practices in constructing both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nd the livelihood of living by the sea.

Keywords: fishery labor, maritime anthropology, temporality, fishing methods, local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